

川普第二任首年交易式外交邏輯下 臺灣戰略風險之再評估

林詩凱*

壹、前言

貳、文獻探討

參、理論架構

肆、研究分析

伍、討論

陸、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川普第二任首年為觀察範圍，探討川普交易式外交語言及其政策邏輯，如何透過制度承諾之鬆動，影響臺灣之戰略風險認知。本文主張，交易式外交不僅是川普外交風格之展現，更是一種使安全承諾條件化與可議價化之外交邏輯，並進一步重塑美—台關係中的制度信任與風險評估架構。研究方法上，本文採質性脈絡分析法，建構由「川普交易式外交邏輯」、「制度承諾穩定性」、「臺灣戰略風險認知」與「避險行動策略」所組成之分析架構，以釐清外交語言、制度承諾與政策回應之間的連動關係。研究發現，當美國對台承諾之可預測性與一致性下降時，臺灣對美國安全支持可信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E-mail: sklin1105@ncnu.edu.tw

投稿日期：2025年6月17日；接受刊登日期：2026年3月5日。

東吳政治學報/2026/第四十四卷第一期/頁67-139。

度之疑慮將明顯升高，並促使政策社群採取多邊連結、制度備援以及風險分散等避險作為。理論上則以「交易式模糊外交」概念，補充既有戰略模糊與制度承諾研究，對語言轉向及風險生成機制之解釋不足；於實務上，則建議臺灣建立外交語言預警機制，強化制度韌性與戰略回應能力。

關鍵詞：交易式外交、制度承諾、戰略風險、避險策略、外交模糊性

壹、前言

在當前區域安全結構中，臺灣所面臨的風險，首要源自中國長期且持續的結構性壓力。此一壓力不僅體現在軍事層面的威懾與演訓常態化，也體現在外交孤立、經濟依賴與政治敘事競逐等多重面向。中國透過軍事現代化與灰色地帶行動，逐步提高台海衝突的不確定性，同時亦藉由制度外操作與雙邊施壓，削弱臺灣在國際體系中的可見度與行動空間。在此情境下，臺灣安全並非單一衝突風險問題，而是一種高度仰賴外部安全承諾穩定性的結構性脆弱狀態。故此，臺灣的安全判斷無法僅停留於威脅本身，而必須進一步關注外部安全支撐機制是否具備可預測性與制度穩定性。於此脈絡中，美國作為區域安全秩序的核心支點，其對台政策的制度穩定性與承諾一致性，遂構成臺灣風險認知中最關鍵的調節因素。

正是在此脈絡下，川普第二任首年所展現之交易式外交語言與政策取向，才會對臺灣產生高度不對稱的風險外溢效果。具體而言，川普在第二任首年之外交表述與政策操作，偏離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所強調之穩定承諾邏輯，傾向以交易式（transactional）邏輯處理對外關係，進而對盟邦間既有之規範性承諾與安全架構，造成結構性擾動。此一轉向，並非僅止於政策風格的差異，而是對戰後國際秩序根本邏輯的挑戰。戰後國際制度的建構，核心在於可預測性、制度化與非交易性的承諾安排，無論是集體安全體系（如北約）、多邊經濟機制（如 WTO），抑或對盟邦的價值型保障（如日美、韓美安全協約），皆建立於「信任－制度－承諾」的邏輯鏈條上（陳欣之，2011）。如今，川普的外交邏輯係強調「成本－效益」取向，將盟邦視為需付費購買防衛服務的對象，並將國際安全議題納入談判籌碼（張建一，

2025)。此種外交思維則去制度化、去規範化、去價值化，不僅使美國對外承諾的可信度受損，亦造成國際秩序中的同盟信任機制產生連鎖性鬆動。

雖然美國整體外交行為模式未必發生根本性改變，但川普政府在語言層次上的外交表述，已顯著偏離制度主義語法，進而影響外界對其承諾穩定性的解讀與信任。這種語言上的位移，重新塑造了盟邦對美國安全承諾之可預測性與制度依賴的認知基礎。在制度主義盛行的國際秩序中，同盟關係被視為建立於共享價值與長期協調的制度契約（周旭華，2010）。然而，當川普以個人偏好與即時利益導向塑造外交語言，其所傳遞的訊號便轉向「誰出得起代價、誰才值得保障」的語意結構。結果是，美國對外承諾雖未明確變動，其語言的可議價性卻使盟邦關係逐步滑向交易條件導向的認知框架。對美國而言，「成本—效益」邏輯滲入外交語句與策略鋪陳之中；對盟邦而言，「同盟」不再是穩定制度性保障的象徵，而成為需要持續再確認與重新計價的關係座標。

然而，語言語法的偏移所引發的制度信任鬆動，並非對所有盟邦產生均質效應。相較於擁有條約保障或參與多邊安全機制的國家，那些處於制度邊緣、仰賴非正式承諾維繫安全地位的政治體，更容易因語言訊號的變異而面臨認知落差與風險升高。特別是在川普語境中，外交話語日益傾向以代價論述取代制度約束，使得原本具備象徵性保障的安全承諾逐漸失去穩定可預期性。對這些「非正式盟友」而言，地緣角色與戰略價值便可能遭到重新評價，甚至出現被邊緣化的語意暗示。在這種外交語法與制度預期逐步脫鉤的環境中，制度脆弱性（吳玉山、傅澤民，2022）與安全模糊性（宋學文，2022）相互交織，構成一種不對稱且具滲透力的風險傳導機制，而臺灣正位處於此

風險鏈的第一線。

在當前地緣政治愈加碎裂、制度承諾語意逐步鬆動的時代條件下，臺灣的戰略處境格外脆弱。臺灣既非美國正式同盟，也未納入多邊安全條約架構，其安全建構主要倚賴戰略模糊與象徵性制度支撐。因此，一旦美方外交語言轉向交易邏輯，並引發制度解釋框架的不穩定，臺灣所面對的便不再只是「模糊帶來的不確定」，而是來自語言變異所牽動的「再標價」¹ 風險。此類風險往往潛藏於外交話語背後的交換邏輯之中，難以以傳統軍事威脅或斷交事件衡量，更應被視為一種制度預期瓦解後的連鎖性認知風險，生成於承諾退位、信任裂解與角色誤判的交錯過程之中。

過去有關美台關係的研究，多聚焦於「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王信賢，2022；林正義，2024；羅致政，1996）之觀點，或探討臺灣在中美對抗格局中的戰略地位（張登及，2013；楊志恆，2025）。少有研究將川普獨特的交易式外交視為一套可分析的政治邏輯體系（翁履中，2025），進而反思其對美台制度性承諾的破壞效應與臺灣戰略風險結構的重構潛勢。尤其在川普政府不斷釋出「援台為談判工具」訊號之際（例如：公開宣稱「是否防衛臺灣取決於是否值得」）（Buckley, 2024），此種政策語言與制度行動之間的落差，已不再只是外交技術問題，而是牽涉到國際承諾可信度與地緣政治風

1. 本文所稱「再標價（re-pricing）」，指的是：在交易式外交語境下，原本以制度與規範支撐的承諾，被轉換為可依情境重新估值與交換的「可議價承諾」，其衡量標的是政治與安全上的成本—效益，而非法律文本的改動或正式政策逆轉。而再標價並不同於否認承諾，而是把承諾移至「條件／對價」的框架中：例如以「付費式承諾、負擔分擔、延宕作為談判籌碼、跨議題連結」等語言與作法，將既有承諾從制度性保證降格為可隨時調整的交換籌碼。要言之，本文之再標價描述的是「語言—制度—行為」之間的意義重估過程；它不是法律廢止，也非立即政策翻轉，而是承諾可預測性由「規範預期」轉為「交換預期」的過程，因而需要以程序節奏、訊號一致性與跨議題連結等指標加以辨識。

險評估邏輯的根本轉向。故此，本研究認為，川普交易式外交不僅是一種政策偏好，更構成一種有別於制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外交實踐邏輯。其根本精神是將外交行為視為一場零和談判，任何承諾皆可重新計價，任何盟友皆可重訂條件。臺灣在此種外交語境中的處境，愈來愈類似於「可以討價還價的安全變數」，而非一個具有制度保障與長期戰略價值的盟邦角色。因此，若缺乏對此邏輯的深入認識與制度應對，將使臺灣在地緣博弈中處於愈加脆弱的風險交界。

要言之，當前川普的外交風格並非語言上的偶發失誤，而是根植於一套「交易式外交」的再估價邏輯（**logic of revaluation**）。在此邏輯下，外交承諾不再是一種延續性制度安排，而被重新定義為可隨情境調整、利益再計的策略籌碼。臺灣在此情境下的角色，不再是具有制度保證的「既定盟友」，而逐步被推向「可談可換」的安全變項邊緣。本文之研究動機，即在於回應此一制度語境與語言信號失衡所引發的風險評估問題，並透過建構一套邏輯清晰的分析架構，釐清制度承諾鬆動如何影響戰略風險感知與政策行動回應。若欲釐清臺灣在此交易邏輯下所面臨的制度性風險，僅停留在外交敘事層次已不足以捕捉其潛在的安全脆弱性，極需建構一套具解釋力的分析架構，系統性理解各構面間的因果連動。此種結構性分析，有助於從抽象的外交轉向脈絡中提煉出具體的風險生成機制，並為後續的政策因應與學術分析提供概念架構的基礎。為因應此一分析需求，必須將外交邏輯的變異視為可觀測的解釋變項，並對其制度效應與風險感知進行結構化理解。故本研究遂借用量化研究中變項設計的邏輯思維，轉化為質性導向的理論建構工具。

本研究採用次級資料分析法（**secondary data analysis**），雖屬質性取向，然其設計邏輯與分析思維承襲量化研究中對變項關係的理

論架構。亦即研究透過變項導向的分析邏輯，將量化思維轉譯為質性資料的脈絡詮釋，實踐以結構關係為核心的質性分析實作。本文據此建構一套四個變項的解釋模型，包含自變項「川普外交的交易邏輯」、中介變項「美國對台制度承諾強度」、依變項「臺灣戰略風險認知」、以及調節變項「臺灣避險行動策略」。研究旨在透過質性文本解析外交邏輯、制度信任與風險認知之間的因果鏈結，進而揭示臺灣如何透過避險行動進行回應與調節。此理論架構亦可作為後續研究推進量化建模與驗證操作之基礎參考。

在承襲量化思維所建構的質性分析架構下，本文得以針對「外交語言」與「制度行動」之間的結構落差進行層層拆解與邏輯詮釋，並捕捉川普外交策略轉向所引發的制度信任弱化與風險感知升高的連鎖反應機制。進一步地，藉由調節變項的引入，本文亦能闡明臺灣如何透過避險行動進行策略性回應與風險調節。在此分析架構下，本文所採取的分析單位為「制度語言互動下的決策圈（policy decision circle）」，涵蓋總統幕僚、國安會成員、外交部官員及執政黨涉外智庫顧問。這一群體不僅直接參與對美互動之決策流程，亦扮演詮釋外交語言、感知制度穩定性與建構風險敘事之關鍵角色。透過針對該群體之語意與行動模式進行質性脈絡分析，本文得以掌握其如何在「交易式外交邏輯」重構制度環境的脈絡中，生成對於安全承諾與戰略穩定性的再評估。此一分析單位之選擇，具體回應「制度語言鬆動」與「避險行動擴張」之交織關係，亦突顯小國在面對強權戰略變動時，其內部決策圈如何轉化不確定性為可操作的行動策略。

在此脈絡下，本文的分析並非意在將川普現象普遍化，而是藉由具體行動場域觀察制度語言與決策互動的連鎖效應。透過決策圈內的語用模式、文件表述與互動語境，本文試圖辨識外交語言如何在制

度層次生成影響力，進而改變行為者對承諾可信度與風險邊界的詮釋方式。此設計兼顧理論可外推性與經驗脈絡性，避免將川普式外交視為單一個案，而是將其作為檢驗制度穩定性與語言治理邏輯的分析入口。換言之，本文欲從具體決策互動中抽取可比較的制度性經驗，藉以回應「一般化」問題，同時維持理論推論的邊界與脈絡敏感性。由此可見，川普式語言並非偶發政治現象，而是制度語境下行為規範變動的測溫儀。透過觀察臺灣決策圈的應變邏輯，本文得以從具體語用實踐推導外交制度的彈性邊界。此分析也為後續理論建構奠定經驗與概念的連結基礎。

綜合分析觀察與理論對話，本研究提出三項關鍵貢獻。其一，在理論層面，建構出「交易式模糊外交」(transactional ambiguity diplomacy) 概念，以補足既有戰略模糊與制度主義理論對川普式語言與行為邏輯的解釋侷限。其二，在方法論層面，創新性採用變項導向的質性資料詮釋邏輯，並整合外交語言與制度意涵的多層次脈絡分析。其三，在政策實務層面，提供一套分析「以台易中」² 風險生成機制的解釋架構，協助臺灣於制度承諾弱化與外交語言變調的交錯情境中，進行情勢研判與前瞻應對。

總體而言，本文所關注的並非美國整體外交行為模式的根本轉變，而是川普第二任首年外交語言邏輯的顯著偏移，如何作為制度鬆動的前導訊號，引發臺灣對戰略環境的再評估。當外交語言逐步擺脫

2. 關於「以台易中」一詞，本文所欲指出的主詞為「美國」。此詞意在揭示川普政府於第二任期內，如何將臺灣納入其對中博弈的交換邏輯之中。美國作為主動設定議價條件的行動者，透過條件性安全承諾與語言模糊策略，使臺灣在地緣政治中處於高度不確定的被動位置。進一步來說，本文所稱「以台易中」，係指美國在交易式外交語境中，將對台承諾置入與中國相關之談判，與策略配置的可議價化風險，其內涵為承諾從制度性保證滑向條件性交換，並不意指把臺灣作為實質交換標的或放棄台海。

制度承諾的穩定語法，而轉向以利益交換為核心的語意結構，其所反映的並非政策本身的立即轉折，而是制度信任預期的悄然變異。在此語言交易化逐步侵蝕制度穩定性的脈絡中，唯有及早辨識語言背後潛藏的「非明示性承諾」（*tacit commitments*）與「再標價傾向」，並前瞻性建構多層次的安全緩衝與策略支撐網絡，臺灣方能避免於美中博弈之中失去其談判籌碼與地緣主體性。進一步而言，真正深層的風險，往往並非源自明確違背承諾的行為，而是潛伏於語言模糊與制度靜默中的角色重新定義過程。因此，臺灣在面對戰略不確定性時，所需發展的不僅是風險識別與管理能力，更是一套能主動監測其國際定位邊緣化徵候的制度性預警機制，以維持政策應對的主動性與戰略彈性。

在研究範疇與研究限制部分，本文的分析範疇主要聚焦於川普第二任首年「外交語言邏輯」的變化與其所引發的制度信任偏移，旨在探討「交易式外交」作為政治語言與認知框架的作用，而非全面描述或預測美國外交政策的整體行動軌跡。換言之，研究關注的重心在於川普個人領導風格所展現的話語策略如何改變制度互動的語意結構，進而影響臺灣對戰略環境的理解與回應。至於川普內閣及其政策執行團隊的實際決策行為，雖與總統話語之間存在交互作用，但本文並未以制度內部決策機制為主要分析單位。此限制意味著，本文所呈現的觀察結果主要反映「外交語言層次的制度鬆動效應」，未涵蓋行政體系內部協調、國會監督或官僚制衡等面向。未來研究可進一步延伸至美國內部決策生態，分析川普個人話語與內閣政策之間的落差與傳導效應，以補足本文在制度層次與政策實踐層面的侷限。

貳、文獻探討

為掌握川普時期外交語言與政策表述方式的轉變對臺灣戰略風險之影響，本研究回顧三項理論構面作為分析基礎。首先，交易外交邏輯揭示川普政府如何以利益最大化為語言主軸，鬆動傳統以制度承諾與價值連結為核心的外交語法；其次，戰略模糊與制度承諾理論提供理解美國對台安全保證中模糊性與可信度矛盾的視角，有助於解析制度預期不穩對風險感知的影響；最後，避險策略與風險認知相關研究則補足臺灣如何在高度不確定環境下，透過多元安全布局回應外部戰略風險之討論。透過此三構面之整合，本文建構出一套分析外交語言轉向與制度信任鬆動對臺灣風險感知與行動策略之連鎖反應架構。

一、交易式外交邏輯（Transactional Diplomacy）

川普的交易式外交，標誌著一種與傳統制度主義外交實踐顯著不同的轉向。其外交行為不再以聯盟價值、規範共識或制度約束為前提，而是強調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雙邊交易關係，形成學界所謂的「交易外交邏輯」（翁履中，2025）。此一邏輯視外交為成本－效益評估的延伸，把安全承諾、貿易協議、軍售與戰略支持轉化為可被標價、可被討價還價的交換性資源。

相較於傳統外交中的「制度主義」，交易外交不假定盟邦關係具有道德義務或歷史責任，也不將國際承諾視為不可逆的契約安排。在制度主義者如 Keohane（1988, 2005）與 Ikenberry（2001）看來，穩定的國際秩序仰賴持續可預期的制度承諾與規範性框架。而川普外交則完全背離此一架構，將國際關係視為「每一輪皆需重新議價的交

易賽局」。因此，在川普邏輯中，是否維持對台安全承諾，不取決於價值一致性或區域穩定性，而取決於臺灣是否能在經濟、軍事、外交上為美國提供「足夠回報」（侯姿瑩，2025c）。

此類交易導向的思維，首先可見於川普對北約（NATO）的態度。他多次批評北約盟國未達到國防支出門檻，並公開表示「美國不會無償保護不付錢的盟國」（張文馨，2024）。此言論對制度性同盟承諾造成嚴重衝擊，反映出川普將集體安全轉化為雙邊代價交換的思維。其次，在對日韓的軍事部署談判中，他亦要求大幅提高駐軍費用，並威脅若無對等回報，美國將重新考慮其承諾規模（羅翊宸，2025）。這些案例顯示，川普對於「制度性盟邦責任」持高度懷疑態度，傾向於依照即時利益重估外交關係。

在美中關係中，交易邏輯的表現更為強烈。川普執政期間，將臺灣問題納入中美談判籌碼之一。例如，2019 年貿易談判過程中，美國暫停對台重要軍售案，同時釋放可能「與中國在臺灣議題上重新協商」的訊號（黃安偉、Schmitt，2019）。這類行為雖未必直接改變美國的正式立場，卻強烈暗示在川普邏輯下，臺灣地位可視為一種「可重新標價」的籌碼。在 2024 年總統辯論中，川普更表示：「是否協防臺灣，要看我們能從中獲得什麼。」（Buckley, 2024）。此語言不僅顛覆了以往戰略模糊的內涵，更轉化為一種徹底可交換的決策邏輯。

學界對交易外交的評價分歧。有學者如 Daalder 與 Lindsay（2018）認為川普的外交是對規則性秩序的全面破壞，將美國從國際領導者退化為機會主義參與者。也有觀點指出，交易外交雖破壞制度穩定，卻在某些情境下強化美國的「策略彈性」與「談判主導權」。Adamson 與 Greenhill（2023）也指出，交易式外交其實是一種「選擇性制度參

與」模式，美國並非完全否定制度，而是將制度視為可供操作的工具。此觀點為分析川普外交提供了更具細緻度的理解框架。

然而，對於非正式盟友而言，交易外交邏輯造成的風險尤為嚴峻。臺灣並未與美國簽訂正式的防衛條約，其安全保障來自《臺灣關係法》與行政部門的政策實踐（許忠信，2014）。當美國總統將對台承諾視為可議價選項時，制度可信度隨即下滑，使得原本仰賴非正式承諾建構之安全感知架構逐漸崩解。這種風險並非源自明確的敵意，而是源於制度鬆動與預期落差的積累，導致臺灣在面對外交語言與實際行動不一致時，難以進行精準風險判讀。

此外，川普外交風格高度個人化，使政策缺乏跨層級制度制衡機制（鍾佑貞，2024）。國務院、國防部與國會對川普的外交決策多缺乏預警與參與，造成外交政策變動高度依賴總統意志。此一現象使得外交承諾進一步失去制度性「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不僅加劇盟邦焦慮，也使臺灣在應對美國政策轉變時處於資訊不對稱與策略遲滯的困境。

綜上所述，交易外交邏輯不僅改變了美國的外交風格，更動搖了戰後建立的制度性安全承諾架構。對臺灣而言，其風險並不來自外交政策是否改變，而在於政策的可變性本身。在川普式邏輯主導的外交語境中，制度的模糊不再是戰略工具，而成為風險來源。唯有理解此一邏輯如何運作，方能正確評估臺灣在其中所處的脆弱位置，並為後續制度性防護與多元安全布局奠定概念基礎。

二、戰略模糊與制度承諾（Strategic Ambiguity and Commitment Theory）

在理解美國對台外交邏輯的過程中，「戰略模糊」一直是維繫兩

岸與美國三邊互動穩定性的核心策略之一（Tucker, 2005）。戰略模糊的本質，在於刻意不清楚表明當中國對台動武時美國是否會軍事介入，透過模糊的承諾創造威懾效果，同時避免刺激中國的敏感神經。然而，在戰略模糊運作的背後，制度承諾的強度與可信度（credibility of commitment）才是真正影響盟邦信任與地區穩定的關鍵因素（Fearon, 1997; Jervis, 2017; Schelling, 2014）。美國對台的戰略承諾之所以能發揮作用，並非僅因語言模糊性本身，而是依賴一套長期、穩定且可預期的制度性支持架構（Ikenberry, 2001）。

歷屆美國政府透過《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1979）所提供的制度化基礎，使得即便在缺乏正式外交承認與條約同盟的情況下，美台關係仍具備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與戰略連動性。軍售政策即是一項具體體現。自 1982 年「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s）後，美國即承諾對台提供足夠自衛能力的軍售支持，並視此為維繫區域軍力平衡的重要手段（Kan, 2009）。即便此一行為未納入正式條約框架，卻透過國會監督與跨黨支持，形成具「半制度化特徵」的承諾機制（Bush, 2021）。

事實上，當川普政府將交易邏輯引入外交承諾邏輯後，這種制度支撐出現顯著鬆動。首先，川普在任內多次公開表示是否協防臺灣將取決於「美國能從中獲得什麼」（Buckley, 2024），此種語言明確破壞了戰略模糊的核心精神，使其轉變為「策略不確定性」甚至「策略任意性」。在語言表述上，川普政府打破歷任總統對台語境上的「一致性框架」，改以即興式表態處理敏感議題，導致制度承諾的可預測性迅速下滑（Brands, 2018）。

其次，雖然川普政府在任內批准多筆對台軍售案，其總量與頻率一度受到外界關注，但相關決策過程與宣布時機卻呈現高度個人化

與策略性特徵。舉例而言，2019 年美中貿易戰期間，部分對台軍售案曾出現延宕情形，並被外界解讀為對中談判的潛在籌碼（黃安偉、Schmitt, 2019），顯示原本制度化運作的安全承諾機制，已開始被納入外交議價的操作邏輯之中。此一轉變不僅削弱制度承諾的穩定性，也使臺灣在判讀美國政策訊號時面臨資訊不對稱與策略錯判的風險（Ali, 2015）。誠然，單一軍售案的延宕尚不足以構成承諾弱化的常態判斷，亦可能僅反映行政排程或程序性因素。然而，當延宕現象同時伴隨跨議題連結與條件式表述，其性質即難以被簡化為技術性調整。更進一步而言，若相關政策訊號來自不同政府部門，且呈現明顯口徑不一，則其對承諾可信度的衝擊將更為顯著。

舉例來說，美國國務院官方在 2025 年 2 月更新對臺灣政策的網頁內容時，刪除了「不支持臺灣獨立」的語句，引發外界對是否改變政策的討論，後續說法需由不同部門澄清，旨在重新呈現美台關係的最新事實，而非改變基本政策方向，並重申反對兩岸單方面改變現狀的立場仍然存在（鍾佑貞，2025a）。美國國務院此舉同時加入了對臺灣在國際組織中參與的支持表述，這表明語言調整也伴隨著對台政策框架的延伸，而不是削弱既有制度承諾（Mallard, 2025）。顯然，這類語言與措辭的調整，在制度性分析中既有其敏感性，也具有一定的策略性。語言層面的變動往往反映不同部門在功能定位與政策重點上的差異或偏好，並不必然等同於政策承諾核心的方向性改變。

在這樣的語言調整背景下，美國官方在其他場合仍然維持制度性框架下的連貫表述。例如，美國國務院在 2025 年 10 月的官方聲明中重申其「以《臺灣關係法》及相關政策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的立場，並指出反對任何一方以武力或脅迫片面改變現狀，語言仍以制度性承諾框架為核心（Taipei Times, 2025）。同樣地，11 月 14 日美

國政府正式向國會通報一筆約 3.3 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其中涵蓋 F-16、C-130 及經國號戰機的非標準零組件與維修支援，此案延續了長期以來美國對台軍售的正常化程序，並再次表明行政部門依據《臺灣關係法》與既有政策框架，持續支持臺灣的防衛能力與韌性（Blanchard & Martina, 2025）。在 12 月 4 日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SS）報告中，美方語言偏向概括性，強調維持印太區域軍事優勢與資源投入，並未直接重申條約性支持詞句，但整體語境仍未背離制度性策略架構（The White House, 2025）。在 12 月 17 日核准逾 111 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之後，美國國防部照例通報國會，展示對台防衛能力協助的實際行動，但具體項目安排與後續國會程序反映出跨部門在優先順序與細節檢視上的不同考量，使盟友在解讀美國安全承諾時面臨來自不同層級與語境的訊號（Blanchard & Martina, 2025）。

由此可見，跨部會口徑不一的現象，將進一步放大盟友對美國安全承諾可信度的疑慮，並提高其安全評估上的不確定性。這類語言差異本質上反映的是各部門的功能定位與策略焦點，而非核心承諾方向的真正對立。故此，在外交決策分析中，美國政策圈對臺灣防禦策略的內部辯論與討論確實存在，這種辯論有時會讓外界感受到某種「不連續性」，但這種現象不等同於跨部會政策本身在核心承諾方向上的矛盾。但這種不連續性的感受，更多反映的是策略層次上的論辯與調整過程，而非跨部會政策在基本目標或承諾方向上的實質分裂。進一步來說，臺灣政策圈對於美國對於臺灣防禦政策，感受「不連續性」可能來自多重因素，而不是單一「口徑不一致」。而這種感受上的「不連續性」並非單純源自政策核心承諾的動搖，而往往反映出語言與情境層次間的切換與交錯。

一方面，戰略性語言的轉變會讓政策接收者感到不連續，即當長期安全文件中的正式措辭與短期政治講話中的策略語言在表述上出現變化時，聽者易將語言上的差異解讀為政策方向上的不一致；另一方面，多重安全議題的交疊也會影響政策語境的連貫性，例如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對全球安全架構的優先排序調整，可能使部分分析者在觀察美國對台策略時感覺焦點有所遷移，進而產生短期內策略重心變動的印象。此外，媒體與公共話語的放大效應也不可忽視，因為輿論與新聞報導往往聚焦於語言上的變化或特定事件，而未必完整呈現官方政策的整體穩健性，這樣的報導節奏與框架選擇本身會影響大眾對政策一致性的感知。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外界感受到的「語言或敘事不連續」，但並不必然等同於核心政策立場上的真正分歧。

在此情況下，安全承諾所賴以成立的可預測性與信任基礎勢必同步下修，使盟友難以形成穩定的風險預期。面對此一結構性不確定性，臺灣決策圈有必要重新調整對美安全承諾的風險定價，並透過制度化溝通機制與多邊嵌入策略，分散高度個別化政策語境所帶來的外溢風險。基於此，承諾是否出現弱化，應回到跨部門協調程度與政策程序一致性的整體觀察，而非僅憑單一軍售延宕或個別政治發言即作出判斷；唯有後續政府能恢復穩定的跨部門口徑與長期政策錨點，方能有效對沖交易式外交情境下安全承諾被可議價化的風險。亦即，安全承諾的可信度不僅體現在單一政策工具的存在與否，而更深層地繫於制度運作是否具備一致的語言邏輯與可延續的決策節奏。當承諾被反覆置入談判與條件化語境之中，其制度效果即須重新檢視，而非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背景條件。

至於跨部會口徑不一是否會進一步削弱政策的穩健性與連續性？這需要從語言層次、政策文件與實際行動三個層面來加以辨析。

首先，縱然美國國務院在 2025 年 2 月更新對台政策的官方說明時刪除了「不支持臺灣獨立」一語，從而引發部分輿論與國際評論對政策方向的猜測，事後官方強調該變動屬於例行資訊修訂，並未改變美方對兩岸現狀和反對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基本立場，亦加入對台在國際組織參與等支持語句以呈現完整關係架構，此類措辭調整本質上反映不同部門在語言策略與政策重點上的差異，而非核心政策承諾的方向性改變。相應地，美國國務院於 2026 年年初再次公開聲明時重申對台海和平穩定的支持，並敦促相關方克制，充分展現制度性承諾語言在不同場合的一致性與延續性（外交部，2026）。

其次，在實際政策操作上，美國在 2025 年底核准多項對台軍售並由國務院與國防安全合作署依常規程序向國會通報，相關官員公開表示「本屆政府對臺灣的長期承諾持續不變，已維持超過 40 年」，顯示即使在語言層次出現細微差異，制度性行動仍透過正式程序持續執行，並未出現實質削弱的證據（侯姿瑩，2025a）。在軍售程序上，美國國務院負責通知國會與國際事務，而由國防安全合作署（DSCA）等美國國防部下屬機構具體發布軍售細節與「知會國會」消息。這種運作模式本身就涉及不同部門的語言與政策節奏，即使最終政策方向一致，但程序性語言與公開表述的差異可能導致理解上的不一致。例如 DSCA 公布軍售時的新聞稿內容往往著重項目細節與執行層面，而國務院的官方聲明則側重於政策承諾與國際立場，即便兩者都指向同一軍售結果，但在訊號的重點與語境上並非完全相同（李瑋萱，2025）。這樣的程序性連續，不僅展現在軍售本身，也在對外政策聲明與外交互動中呈現出一致性，與單一措辭或個別聲明之間的語言差異形成對照。

因此，跨部會口徑上的語言差異更多反映出外交決策體系中不

同機構根據其功能與任務對政策語境採取不同表述方式的常態，而不是政策承諾本身不穩健或斷裂的證據。對於臺灣決策圈而言，應把焦點放在制度性文件、實務行動與多部門政策協調的整體一致性上，而非僅憑語言措辭的短期變化來判斷承諾是否被削弱。這樣的分析視角有助避免將正常的政策程序與語境調整誤讀為長期承諾的動搖或結構性弱化。在此意義上，制度承諾的穩定性並不僅取決於單一政策工具或語句，而更關乎政策語言的一致性與制度運作的延續性。只有當這些語言與程序上的一致性被長期維繫，制度性承諾才可能被理解為具備可預見性、連續性與跨政府延續性。

要言之，制度承諾的強度亦來自於跨部門的一致性與永續性。過往美國總統拜登試圖重建此一制度基礎，例如強化對印太戰略中臺灣角色的明確表述（趙明昊，2022）、恢復跨部門一致性的外交聲明，並將《晶片法案》與供應鏈安全納入對台政策中。但川普時期所開啟的「承諾可議價化」先例，使得臺灣不得不重新思考制度信任的結構基礎（潘姿羽，2025）。顯然，制度承諾的可信度，不僅來自於是否有軍售、有援助，更在於其是否具備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一致性（consistency）與跨政府延續性（continuity）（Fearon, 1997）。在戰略模糊的語境下，這些制度指標才是臺灣用以解讀美國行為意圖的核心依據。當這些制度訊號被語言策略模糊所取代，戰略模糊即不再是平衡威懾與穩定的工具，而轉化為風險的源頭（Ashford & Kroenig, 2020）。對臺灣而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制度是否仍運作，而在於制度訊號是否仍具一致性與可預期性。當美方政策語言逐漸轉向條件式表述與談判化敘事，即便制度框架未遭破壞，其「信任韌性」仍受到侵蝕。本文藉此揭示制度語言的變化如何重新定義盟友間的風險互動，也為後續分析川普時期外交體系的「語言治理模式」

奠定理論基礎。

總結而言，戰略模糊若無制度承諾支撐，將失去其威懾效果並製造認知混亂。川普時期的對台言論與政策作為打破了語言一致性與制度延續性，使得臺灣所依賴的安全信號出現斷裂。然而，本文並非忽視川普政府中仍有制度維穩的力量存在。如國會中的 Rubio（Thompson & Chung, 2025）、國務院體系（Martina et al., 2025）與 AIT（鍾佑貞, 2025b）等，皆持續以制度化語言再保證美台合作的穩定性，並推動多項對台政策工具。川普在第二任期首年，美台軍售雖名目持續，國會也未中止對台支持，這顯示制度承諾並未崩解，反而呈現一種「表層穩定、語用分歧」的張力格局。此即本文所界定的「語用落差」現象：制度性承諾並未從結構上消失，實際作為也仍可見持續性，但當總統語言轉向即時、計價與條件性風格，與既有制度語境發生邏輯偏離，將削弱外部行為體對政策連貫性的預測能力，進而模糊盟邦對制度可信度的解讀與信任建構。

故此，本文主張，川普並未解構整體制度體系，而是透過其語言風格鬆動制度的穩定性黏著。這種鬆動未必反映於政策量化指標之中，但在外交政策的語用層次，已足以影響制度所依賴的象徵權威與訊號一致性。對臺灣而言，制度可信度的建構不僅仰賴實質作為，更高度依賴語言與制度的一致訊號。當這種訊號落差持續擴大，即便仍有制度性作為支撐，臺灣在風險預期、外交判讀與安全策略上，將面臨更多模糊與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壓力與成本。理解此一制度鬆動現象，有助於進一步分析「川普式戰略模糊」如何加劇臺灣風險認知的不確定性，並為避險策略與制度重構提供理論基礎。

三、避險策略與風險認知架構（Hedging and Risk Perception）

在川普第二任首年美中戰略競爭進一步升高的背景下，臺灣所處的安全環境顯得格外脆弱。川普政府第二任首年明確採取「交易式外交」（*transactional diplomacy*），對盟邦安全承諾採取條件式重新議價的態度，導致臺灣無法再單純依賴美國的制度性保障。過往「戰略模糊」所提供的嚇阻效果與戰略保險，如今在川普政府「誰出得起代價、誰才值得協防」的語境下逐漸失效。因此，臺灣勢必要發展更加靈活且多元的避險策略，以因應快速變動的地緣風險與政策不確定性。然而，在國際關係理論中，避險（*hedging*）策略被視為小國面對大國競爭與不確定性時的關鍵工具。其基本邏輯在於，國家在與強權互動時，避免採取極端的抗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而是透過同時與多方維持關係，爭取外交與安全上的迴旋空間。相關研究指出，避險策略不僅涵蓋傳統安全領域，亦延伸至外交與經濟層面，其關鍵在於透過風險管理與利益最大化的雙重機制，維持政策彈性與國家自主性（*Kuik, 2008; Weitsman, 2004*）。

相關研究顯示，避險並非僅限於傳統安全領域，而是涵蓋外交與經濟等多重面向，透過多元合作關係來維持戰略自主性與政策彈性（*Weitsman, 2004*）。此外，避險的核心邏輯在於同時追求風險管理與利益最大化，國家在面對強權競爭時，會傾向與多方維持互動，以避免陷入過度依賴單一勢力的結構風險（*Kuik, 2008*）。針對東南亞國家的實務案例，已有研究指出，這些國家採取「全方位交織」（*omni-enmeshment*）與「複數承諾」的方式，藉由安全與經濟雙軌操作，在美中競爭中取得外交迴旋空間（*Ciorciari & Haacke, 2019*；

Goh, 2005)。在歐洲與東亞的案例中，歐盟透過區域整合與多邊外交維持戰略空間（Toje, 2011），而日本則發展出多層次的外交布局，以在不確定的國際體系中維持其靈活性與制度韌性（Lim & Cooper, 2015）。近期亦有針對次級國家進行的避險能力分析，強調其透過內部能力建構與靈活外交工具，有效管理風險並擴大政策自主性（Jones & Jenne, 2022; Vander Vennet & Salman, 2019）。

對臺灣而言，川普第二任首年政府對制度承諾的去信任化、對台軍售與支持的可議價化，以及高關稅政策的再實施（即便半導體被豁免），皆大幅提高了外交與經濟上的制度不確定性。在此脈絡下，臺灣需加速發展避險策略，包括加強與美國以外的民主國家建立安全對話、參與多邊區域機制（如 CPTPP）、並推動供應鏈多元化以降低對中國與美國的過度依賴。顯然，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度穩定性已不如以往，川普第二任首年對制度性承諾的弱化趨勢，使得傳統盟友開始重新評估美國作為集體安全提供者的可信度（Swaine, 2023）。這種不確定性不僅體現在軍售的延宕與談判化，更反映於關稅政策的單邊主義與利益導向，使臺灣在面對川普政府政策轉向時，處於高風險的交叉點（Brands, 2018）。面對此一情勢，學界亦指出，中小型國家若無法建立備援安全架構與制度性外交網絡，將更容易成為強權博弈下的議價籌碼（Goh, 2005）。

此外，風險認知在政策制定中扮演核心角色。面對川普第二任首年政府對盟友所釋放的不確定訊號，臺灣政府必須根據對外部威脅的評估，靈活調整避險策略的重點與配置。根據風險社會理論，現代社會的風險不僅源於自然災害，更多來自於人為活動和制度變遷，這使得政策制定者必須具備高度的風險感知能力，以應對潛在的挑戰（Beck, 2013）。而民眾對於各類風險的感知會影響其對政策的支持

度，進而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方向（林宗弘等人，2018）。

事實上，在川普第二任首年下，其外交政策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臺灣面臨的風險。特別是川普政府對盟友的制度承諾日益模糊，對台軍售與支持變得可議價化，以及高關稅政策的再實施，皆大幅提高了外交與經濟上的制度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使得臺灣需加速發展避險策略，包括加強與美國以外的民主國家建立安全對話、參與多邊區域機制（如 CPTPP）、並推動供應鏈多元化以降低對中國與美國的過度依賴。

面對川普政府對盟友所釋放的不確定訊號，臺灣政府必須根據對外部威脅的評估，靈活調整避險策略的重點與配置。由於川普第二任首年政府的外交政策傾向於交易性外交，一旦川普在重大國際談判中將臺灣作為談判籌碼，增加了臺灣在國際舞台上的不穩定性，臺灣勢必要尋求新的安全保險網與外交突破點。根據中央社 2025 年 3 月 6 日的報導指出，川普政府對臺灣的軍事支持也呈現出高度不確定性，不僅揚言臺灣應為自身安全付出代價，更將軍售視為補償貿易失衡的工具，導致安全承諾從制度保障轉向可議價的交易條件，進一步壓縮了臺灣的戰略空間並加劇財政壓力。與此同時，川普多次聲稱臺灣「奪走」美國的晶片生意，並宣布對臺灣商品加徵 32% 關稅，雖然半導體產品最終獲得豁免，但此舉仍動搖了臺灣對美國經濟與安全支持的信心，進一步突顯其對台政策的高度不確定性（Blanchard, 2025）。

總結來看，川普第二任首年的外交邏輯代表一種從制度主義邁向高度交易化的根本轉變，進而重塑臺灣所處的區域戰略環境與制度信任基礎。隨著對盟友承諾日益條件化、軍售與經貿政策逐步轉化為可議價的外交籌碼。而臺灣面臨的不確定性已不再只是來自中國

威脅本身，更源於美國政策可預測性的斷裂與制度保證的鬆動。在此背景下，以往依賴戰略模糊與非正式制度承諾所建構的安全架構逐漸失效，致使臺灣必須積極發展避險策略，以維持其在不確定國際體系中的戰略彈性與政策選擇空間。然而，避險策略並非單一外交技術，是一種面對風險與制度流動性的回應邏輯，涵蓋安全、經貿與多邊參與等層面。特別是在川普式語境中，制度不再是保障，而是可議價的條件；模糊不再是威懾，而是風險的來源。因此，唯有透過系統性掌握交易外交的邏輯、辨識制度信任的斷裂過程、並強化風險感知與政策調整能力，臺灣方能避免成為大國談判桌下被動重構的籌碼，進而在戰略不確定性中維持其主體性與安全邏輯。

參、理論架構

本文旨在建構一套能解釋川普第二任首年交易外交邏輯如何透過制度信任斷裂，進而引發臺灣風險認知變化與政策回應之理論架構。為回應本研究「以台易中？」的核心問題，本文從川普第二任首年的外交語境、制度基礎與行為反應三個層面出發，建構一個具邏輯連動的分析模型。此架構不僅強調外交邏輯轉變的解釋力，也試圖將理論概念具體操作化，以連結臺灣對戰略風險的主觀認知與實際因應行動之間的結構關係。為提升理論架構在高度異質政策語境中的解釋力與適用性，本文進一步區分分析對象的角色類型與內部差異，並提出具體策略以處理其在認知與行動上的差異性反應。雖然本文以「發話者」、「維繫者」與「感知者」作為主要分析角色，卻不將三者視為內部一致的同質群體。相反地，本文強調每一類行動者內部皆具顯著異質性。特別是「臺灣戰略社群」涵蓋泛藍與泛綠、地

方與中央、政黨與智庫等多元政治位置；而「美國制度維繫者」則橫跨 MAGA 與建制派、國會與行政體系等不同派系與治理文化。本文主張，即便在這樣的異質架構中，仍可透過川普政府交易式外交的語言邏輯，揭示其如何製造制度預期落差與戰略風險感知的斷裂點，進而誘發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風險敘事與避險行為模式。基於上述理論思考與角色設定，本文接續從分析架構與變項設計兩個層面，進一步具體化本研究的概念邏輯與操作路徑。

一、分析基礎與架構思維

本研究雖採質性脈絡分析法，但其理論邏輯承襲自量化研究對於變項設計與因果關係之分析方法。透過轉譯與詮釋，本文建立一套由四個變項所構成的結構性邏輯模型：（1）自變項為「川普交易式外交邏輯」；（2）中介變項為「美國對台制度承諾」；（3）依變項為「臺灣戰略風險認知」；（4）調節變項為「臺灣避險行動策略」。此模型呈現出外交邏輯如何透過制度機制影響風險感知，並在臺灣政策行為中受到戰略回應與調整的過程。此理論架構建立在以下三項整合性前提之上：

1. 外交行為邏輯具有可觀測性與系統性連貫性：川普的交易式外交不僅是個人偏好，更是一種制度性行為模式，其對制度與同盟的態度可透過語言與行動分析歸納為特定邏輯。
2. 戰略風險認知作為外交制度鬆動的認知回應結果：「臺灣戰略風險認知」指涉臺灣對國際安全局勢變化的主觀評估，特別是對美國安全承諾穩定性的判斷、區域軍事威脅強度的認知，以及在多邊秩序中自身位置的風險想像。
3. 制度承諾強度作為風險感知的中介變項：制度本質的穩定性與

延續性，是小型或非正式盟邦形成安全判斷的核心依據。制度信任若受損，風險認知即隨之上升。

4. 避險策略作為風險反應的行動調節變數：國家面對高不確定性，往往採取策略性的多元安排，以維持外交與安全彈性。臺灣的避險行動反映其風險評估邏輯與制度應對能力。

總的來說，本文的理論設計雖然承襲量化變項關係的分析邏輯，但在實際操作上，則採用質性脈絡分析的取徑，將制度鬆動的語用變化轉化為可觀察的政策實踐與認知結果。本文主張，外交語言的交易化傾向正在重塑制度預期與信任基礎，促使臺灣戰略社群從既有的制度依賴模式，轉向更具韌性與多元性的風險調節行動。這樣的變項設計，正是為了回應當代國際關係中，制度失語與小國戰略行動之間日益緊密的互動關係。進一步而言，本文在建構「川普交易式外交邏輯」與「臺灣風險認知」之間的理論連結時，也特別納入分析對象的異質性考量。三類核心角色（亦即發話者、制度維繫者與感知者），雖然構成本研究的觀察主軸，卻並未被視為同質或整體化的行動群體。相反地，本文強調，這些角色內部存在明顯的政治、組織與認知差異，例如臺灣戰略社群中泛藍與泛綠的政治立場、智庫與政府幕僚的角色分工，以及美國制度維繫者內部 MAGA 派與建制派對外交語言與制度信任的歧見。如此安排，既可避免將整體社群簡化為單一行為單位，也會強化本文理論模型對外交互動脈絡的貼切性與解釋力。

二、變項設計與概念操作

本文變項之間的因果機制設定，係採用「理論導向的概念建構法」（theory-driven conceptual modeling），以政治學與國際關係領域的經典與當代表述為依據，推導出變項間的邏輯關係。自變項「川

普交易式外交邏輯」的設計，主要參考 Bashirov 與 Yilmaz (2020)、Schweller (2018) 對於個人化外交與工具性語言的論述，推導出川普外交風格傾向以領導人個人意志與短期交換為核心，削弱了既有制度的穩定性與外交政策的一致性。中介變項「美國對台制度承諾的穩定性」，則根植於 Fearon (1997)、Keohane (2015)、Narizny (2017) 對制度預期與信任建立的理論，說明當政策語言轉向條件式與可議價型態時，制度可信度將出現鬆動。依變項「臺灣戰略風險認知」之設計，借重 Jervis (2017)、Mitzen (2006) 對不確定性感知與國家安全焦慮的分析，指出制度鬆動如何形塑小國的戰略推演。調節變項「臺灣避險行動策略」則援引 Goh (2005)、Lim 與 Cooper (2015) 之 hedging 文獻，主張其為影響風險認知與政策回應強度的策略選項，非純粹行動結果，而具備路徑調節功能。整體架構由此建立，並非由資料歸納變項關係，而是由理論邏輯推導出一套具有一致性與解釋力的概念模型。

(一) 自變項：川普外交的交易邏輯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Logic)

本研究以川普第二任首年的外交邏輯為分析起點，旨在觀察其對戰後制度性承諾安排所產生的干擾與重構效應。相較於過往以制度穩定、價值共識與多邊協調為基礎的外交實踐，川普政府主導下的「交易式外交」展現出一種截然不同的行為邏輯。此一邏輯的核心特徵包括：其一，外交互動的「去制度化」，即不再依循穩定的規範框架運作；其二，承諾評估轉向以「成本－效益」為核心判準，將承諾視為可衡量與可計價的資源；其三，傾向以雙邊協商取代多邊機制，弱化制度之間的集體拘束力；其四，將安全與經濟議題視為可被議價的交換品項，而非不可交易的集體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外交邏輯並非單純源自川普個人的政治風格，而是反映出一種對戰後國際秩序，特別是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所主張之「可預測、穩定與規範化互動」邏輯的根本挑戰（Mearsheimer, 2019）。川普所代表的外交邏輯，實際上標誌著美國對於長期制度參與角色的重新定位，其背後蘊含的是對傳統「制度－承諾－信任」鏈條的去價值化、去道德化與功能性解構。

在實踐面上，川普政府的交易式外交邏輯可從以下三個面向具體觀察：首先，對制度性承諾進行語言上的淡化與政策上的重新議價。例如，對北約、日本、韓國與臺灣等盟邦，其過往以制度性語言維繫的承諾逐漸被「應否付費」與「是否值得」（Glebova, 2024）等語彙取代，模糊了承諾與利益之間的邊界。其次，對盟邦角色的功能重新評價。川普時期的政策論述中，盟邦不再被視為共同價值的防線，而是被視為應為美國承擔戰略成本的「受益者」，導致盟友價值轉向以「貢獻度」與「議價能力」衡量（Smith & Geddie, 2025）。第三，將原先用以規範與穩定國際關係的制度框架視為談判籌碼，而非價值依據（Buckley, 2024）。這種態度使得制度不再具有內在正當性，而僅剩操作上的可用性。

總的來說，川普外交邏輯已超越個人風格或政策選項的範疇，而是一種結構性、可操作、且具破壞性的制度再定義過程。其對臺灣而言，不僅重塑對美國制度信任的基礎，也直接導引出臺灣戰略風險感知的連鎖效應。要言之，當制度失去長期穩定與延續性的特徵時，盟邦所依賴的安全判準與外交預測能力隨之瓦解。對臺灣而言，這不僅意味著安全合作的實質削弱，更代表地緣角色的重新標價與談判定位的邊緣化。在此脈絡下，臺灣須重新審視其對美關係的定位邏輯，並及早建構自主性的政策應變框架。

（二）中介變項：美國對台制度承諾

制度承諾在本研究中具備中介作用，連結外交邏輯與風險感知之間的結構橋梁。根據制度主義觀點，穩定承諾具有三項關鍵特質：預測性（predictability）、一致性（consistency）、與延續性（continuity）。而臺灣過去對美制度信任的建立，正是仰賴《臺灣關係法》、美國國會對台共識、與六項保證等象徵性制度框架（Lawrence, 2026）。惟此一制度性保障的穩定性，隨川普外交邏輯的轉向而出現明顯鬆動，特別是在其任期內將安全承諾視為可議價的資產後，更進一步侵蝕了承諾強度的結構基礎。進一步來說，臺灣過去對美制度信任的建立，正是仰賴《臺灣關係法》、國會對台共識與「六項保證」等象徵性制度框架，這些制度性安排提供了一套雖非條約但具有約束性的安全承諾，支撐台美關係的穩定運作。

然而，在川普政府交易式外交邏輯的主導下，美國對台安全承諾背後的制度支撐逐漸鬆動，其削弱承諾強度的方式表現在若干層面。軍售，原本被視為制度性承諾的具體實踐，近來卻日益轉化為具交易屬性的談判籌碼，顯示美國對台支持逐步喪失過往的可預測性與穩定性。例如喬治梅森大學的報告指出，2025 年 1 月至 2 月期間，美國未宣布或交付任何新的對台軍售案，軍售積壓總額仍維持在 215.4 億美元，顯示軍售進程呈現遞延與觀望態勢（Gomez, 2025）。誠然，川普政府於 2025 年 1 月 20 日方才上任，若僅以短期空窗斷言軍售承諾已然失效，確有簡化之嫌。而本文所關注者並非行政技術層次的延宕，而是川普外交語言中不斷釋放的交易訊號，如何在語用層面改變制度的語義邏輯，使得安全承諾從穩定保障轉化為可議價資產。當語言風格導向談判與互惠，盟邦所感知的制度信任也隨之動搖，進而加劇對風險的不確定與遲疑。因此，即使制度機制形式上未變，語言

邏輯的轉向已成為預期落差與信任鬆動的核心驅力。

其次，川普政府對軍售案的宣布，展現出高度個人化與時機操作的傾向，逐步侵蝕原本作為制度性承諾表徵的政策一致性與延續性。此一特徵在其第二任首年初期，雖尚未出現具體軍售案的宣布，但已透過外交語言與政策訊號初步顯現。又根據《洛杉磯時報》2025 年 3 月 19 日的報導，川普總統尚未明確表示美國是否會在未來保衛臺灣，反而對美台關係公開表達不滿，並要求臺灣將國防預算提高至國內生產總值的 10%，遠高於現行的約 2.4%（Yang & Wu, 2025）。這種將安全承諾與經濟負擔掛鉤的語言邏輯，突顯其對軍售與安全政策的議價傾向。儘管截至 2025 年上半年尚未出現具體對台軍售案的宣布，本文所論並非單憑短期現象進行推斷，而是根據川普第二任首年以來對盟友關係所採取的「成本換取安全」的思維模式，綜合其對外交政策程序的態度、語言風格與決策慣性，進行合理的風險分析。本文並非否定軍售決策原本即帶有政治考量，而是指出：當政治操作凌駕制度設計，且安全承諾被反覆包裝為談判籌碼，便會削弱其長期信任性與制度預測性，進而增加臺灣於政策規劃上所面對的風險錯判與戰略遲疑。

最後，此一軍售邏輯的轉化，反映出制度性承諾日益朝向「可議價化」的趨勢，使原本依賴戰略模糊與制度性訊號的臺灣，陷入更難預測的外交脆弱處境。進一步來說，川普政府第二任首年內，對台軍售政策呈現高度個人化與時機操作的傾向，破壞了承諾的制度性一致性與延續性，增加政策任意性與風險錯判的可能性。舉例而言，川普總統於 2025 年 4 月 9 日簽署行政命令，指示簡化對外軍售流程，以加快軍備交付（侯姿瑩，2025b），美國國防部隨後調整相關程序，並預計於 2026 年度開始執行部分項目。雖此舉表面上屬行政優化，

實則發生於美台關係緊張之際，亦同步伴隨多項外交與貿易相關命令發布，顯示軍售程序正被納入戰略布局之中。此一流程變動欠缺充分溝通與預期管理，導致戰略訊號的詮釋產生落差，使安全承諾更易被理解為條件化的交易籌碼，而非穩定的制度保障。

顯然，當制度承諾失去其穩定功能，即形成風險傳導的中介機制，使臺灣處於制度信任崩解所引發的不確定風險鏈之中。一旦制度不再提供前瞻性預期與安全保障，而轉化為可議價與可變動的外交籌碼，將使得盟邦無法依循過往規律判讀美國意圖，進一步導致風險判斷的模糊化與行動遲滯。而臺灣在此結構性動搖之下，原先可用以理解美國政策走向的語言與行動基準逐漸失效，轉而需從交易語境中解析潛藏的戰略訊號。此種資訊不對稱所導致的認知落差，進一步擴大臺灣在外交決策上所面臨的不確定感與風險感知負荷。換言之，制度承諾一旦失能，其所留下的空白並不會自然填補，反而成為戰略壓力與心理焦慮擴散的核心通道。

（三）依變項：臺灣戰略風險認知（Strategic Risk Perception）

在川普交易式外交邏輯的牽動下，臺灣所面對的風險已不再僅限於傳統軍事威脅，而是轉化為對制度承諾失效、語言模糊加劇與國際地位邊緣化的主觀感知與情勢預判。換言之，「風險」不再只是外部物理性事件的發生機率，而是一種制度性信任瓦解後所生成的認知性連鎖反應。根據 Beck（2013）所提出的風險社會理論，當代風險之所以深具破壞性，正在於其生成機制內化於制度的斷裂與承諾的不穩。在此脈絡中，風險認知即為國家決策圈對外部環境變動的主觀判讀機制，尤其在美國外交承諾高度可議價化、軍售轉為經濟補償工具、制度性支持陷入靜默失語之際，臺灣無法再以過往「信任－制度－安全」的鏈條邏輯進行風險對應。此時，風險感知本身成為政策

選擇的前提條件，構成國家避險決策的起點。

本研究將臺灣戰略風險認知區分為三個分析層次進行操作：第一，對美國安全承諾可信度的主觀評估，例如川普不願意承擔成本與風險來幫助烏克蘭擊退俄羅斯的侵略，一旦中國侵台，臺灣又能有多大信心，在交易式外交邏輯主導下，川普是否仍願為臺灣承擔足以遏止衝突的安全風險與政治代價；又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在 2025 年 4 月 25 日發布民調顯示，有 15.9% 的臺灣受訪者認為美國是「非常不值得信任」的盟友，近五成受訪者認為美國「不可能」協防臺灣（陳筱涵，2025）。此類主觀評估雖未必直接轉化為政策選擇，卻構成風險認知的重要背景，並影響決策者對外部承諾可預測性的基本假定。正是在此基礎上，面對川普語境下的交易語言與高度可變的政策取向，決策者勢必重新估量華府的制度性支持是否仍具有實質而穩定的政策意涵。顯然面對川普語境下的交易語言與可變政策，決策者如何重新估量華府的制度性支持是否仍具有實質意涵。

第二，對自身國際地位與外交邊緣化風險的體感與預期，包括美國可能將臺灣作為對中談判籌碼的認知，亦即制度性的角色不確定感是否轉化為主動防衛與重新結盟的動力來源。譬如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揭仲副研究員在 2025 年 6 月 8 日表示，美中談判一旦陷入僵局，川普是否會把臺灣的利益當成談判籌碼，換取中國的合作，或以臺灣議題刺激中國（王文承，2025）。此類觀點反映的並非對美國立場的單一質疑，而是一種對臺灣制度性角色是否具備不可替代性的集體憂慮。當此一角色不確定感持續累積，便可能促使決策者重新評估既有安全與外交布局，並將主動防衛與多元結盟視為降低被工具化風險的必要選項。

第三，對未來政策選項與迴旋空間縮減的感受程度，特別是當多

邊機制被弱化、雙邊談判取代制度安排之際，臺灣如何重估自身策略佈局的可能性與限制條件。這種結構性影響可從美國對多邊與雙邊安全機制的不同取舍中具體看出。首先，在傳統多邊架構方面，美國在印太地區推動包括印太經濟繁榮架構（IPEF）這類多邊機制，希望透過供應鏈合作與經濟夥伴網絡強化區域安全與繁榮的共同基礎。在此語境下，臺灣必須重新評估在雙邊安全互動與印太多邊策略之間的政策選項，理解美方可能在不同領域運用不同的政策工具。這種結合多邊經濟合作與雙邊軍事支援的策略調整，既反映出美國對制度性機制的選擇性延用，亦提供了理解交易式外交語境下風險與迴旋空間變化的實證線索。

這三層風險感知並非彼此孤立，而是交互增幅。制度不再具約束性，語言不再具指引性，政策選項的收斂即為戰略風險的具體化。在此架構下，臺灣若無法建構出一套能針對風險認知進行動態回應的決策系統，極可能陷入戰略遲滯與安全被動的雙重困境。換言之，風險認知並非外交語言的附屬產物，而是川普交易式外交語境中，臺灣對其角色、處境與未來可行空間所進行的制度性再認定。此一再認定過程，構成了本研究風險評估架構中的核心依變項。

（四）調節變項：臺灣避險行動策略（Hedging Strategy）

在川普式交易外交邏輯不斷侵蝕制度信任與戰略穩定性的背景下，臺灣是否具備有效的避險行動策略，遂成為影響風險感知是否轉化為戰略受限的關鍵變項。避險策略並非消極性的應對姿態，而是一套融合靈活外交、經濟多元與安全備援的複合型行動邏輯。根據 Goh（2005）、Kuik（2008）的研究，小型國家在強權競逐的縫隙間，唯有透過同時與多方維持交織關係、避免陷入單邊依附，方能保有政策的彈性與安全的主動權。

本研究將「臺灣的避險行動策略」視為一項具結構性的調節變項，關鍵在於其可對美國制度承諾穩定性遭遇挑戰時，所引發的戰略風險感知上升，發揮實質緩衝效果。當川普政府將對台軍售從制度化承諾轉化為雙邊交易，並頻繁以語言暗示「安全保障應由臺灣自行承擔」，傳統依賴《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所建構的制度性信任體系隨之動搖（Daniels, 2024）。在此不確定性升高的情境下，臺灣若能及時採取多元避險策略，例如深化與民主夥伴國家的戰略對話、強化在 CPTPP 等多邊架構中的制度嵌入、並重新布局以半導體為核心的關鍵產業鏈，將有助於形塑政策回應的韌性邏輯，並維持外交決策的自主性。換言之，避險行動的展開，正是臺灣對制度風險感知所進行的主動性調節機制，其成效亦反映出國家安全治理在「交易式不確定性」下的應變能力。

進而言之，避險策略的實踐不僅體現在制度重構與外交多邊化，更在於一種心理與語言層面的「主權自持思」³（Kuik, 2024）。當制度承諾失效、語言模糊成為風險之源時，避險策略即轉化為一種國際語法的重寫行動：透過自我定義的外交立場與安全框架，臺灣得以在談判場域中主動塑形而非被動應對。這也意味著，臺灣的避險行動並非只為降低當下風險，而是為其戰略主體性進行再建構，也是一種國際場域中重新劃定自我定位的治理實踐，而非僅是外交操作技巧。此一調節機制之關鍵，在於其是否足以改變風險感知的傳導力道與方

3. 「主權自持」意指國家在面對外部權力滲透或制度依附時，仍維持自主決斷與價值立場的能力。這是一種「主權韌性」（sovereign resilience）的體現，不僅是政治上的獨立，更是意識上的自我堅持。「自持思」則強調一種思維態度，即不因權勢結構的變動而放棄自我界定的原則，不以依附為生存條件，而以自我節制與主體性為安全基礎。對本文來說，「主權自持思」意味著臺灣不應被動接受外部勢力的安全框架，而應透過避險外交（hedging diplomacy）與策略多元化（strategic diversification）以維持自主空間。這種思維不否認聯盟的重要性，但主張在依附關係中仍須保有策略餘裕與決策獨立性。

向。若避險策略貧弱，制度信任崩解將直接轉化為戰略恐慌與外交邊緣化的強化；反之，若能及時以制度補位與多邊合作填補美國承諾之空缺，風險認知或可轉為預警機制，引導出更具主動性的外交重建工程。顯然，避險策略的強弱不僅是應變能力的指標，更是國家戰略自主性是否仍具延續可能的判準；是一項不僅限於外交的策略選擇，更是一種深層制度治理的行動設計。唯有在政治意志、資源配置與國際溝通的三軸交錯中，才能真正發揮其調節功能，讓臺灣得以在美中博弈的地緣壓力場中保持戰略彈性與主體能動性。

然而，本文所主張的「避險行動策略」，並不同於向中國示好或走向「九二共識」式的政治妥協。避險的本質在於一種制度性調節設計，目標是分散臺灣對單一強權承諾的高度依賴，並於制度風險升高之際，維持決策主體性與安全配置的多樣性。也就是說，避險並非「對中和解」的過渡性策略，而是對美國承諾鬆動風險的理性回應，其戰略邏輯在於拓展多元合作管道與制度性參與機制，藉此提升回應變局的調節彈性與安全韌性。因此，本文的避險策略設計，建立在不放棄主權立場與安全利益的前提下，透過多邊制度參與、經濟鏈重組與非對抗型外交行動，鞏固臺灣於區域秩序中的節點價值與制度嵌入度。換言之，這是一種以主體性為核心的風險管理策略，旨在避免「對中屈服」與「對美依賴」兩端極化風險，並為臺灣在變動中的地緣政治場域中，創造穩定可調度的回應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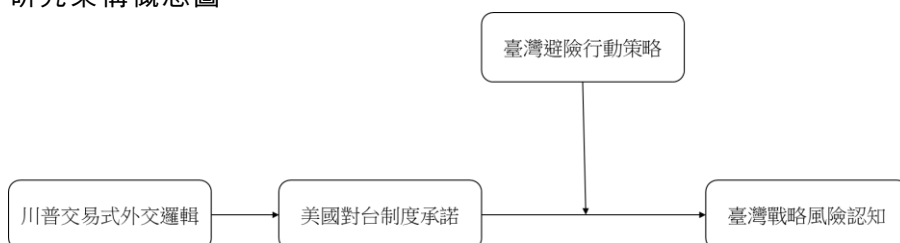
顯然，本文所提出的避險策略設計仍存在若干理論與實務上的侷限。理論上，其假設國家能在政黨輪替與外部壓力之間維持政策連續性與跨部會協調，然而臺灣的外交體系與決策節奏常受內部政治與資源分配制約，使避險行動難以形成長期結構性機制。實務上，雖已透過新南向政策、CPTPP 布局與半導體鏈重組推動多元嵌入，但

成效仍屬選擇性，尚未實質降低對美依附與對中風險。未來若要使避險策略發揮穩定戰略調節功能，應建立可量化的政策績效指標，如多邊參與嵌入度、防衛自主化比率與供應鏈多元化程度，藉以追蹤策略韌性與回應速度。唯有將避險策略制度化與指標化，方能將其由抽象的外交語法轉化為具操作性的國家風險治理工具，使臺灣在不確定性上升的國際環境中，維持戰略穩定與主體能動的實質能力。同時，避險策略的推動亦需社會共識的支撐，否則將因政治化詮釋而喪失長期規劃的正當性。政府必須強化風險傳達與外交透明度，使民眾理解避險並非搖擺，而是一種務實的安全管理。學術與智庫社群亦應建立戰略評估平台，持續檢驗政策執行的回饋機制。唯有在政府、社會與知識體系形成互補性學習迴路時，避險策略方能真正內化為國家韌性的制度文化。因此，避險策略設計的理論發展雖具前瞻性，但仍須在制度化、可衡量化與跨域協調三方面深化，以確保臺灣在交易式不確定性下維持戰略穩定的實質能力。

綜上，本文根據上述論述，試圖建構一套能夠解析川普交易式外交邏輯對臺灣戰略風險產生連鎖效應的理論架構（圖 1）。此架構以四個核心變項為主軸，從外交邏輯的轉變出發，透過制度性承諾穩定性的變化作為中介機制，連結至臺灣風險認知的主觀感受，並由避險行動策略進行調節與回應。自變項為「交易式外交邏輯」，中介變項為「制度承諾穩定性」，依變項為「臺灣戰略風險認知」，而「避險行動策略」則為調節變項，用以解釋臺灣如何透過政策手段緩解風險感知的放大效應。此一架構強調制度鬆動與風險傳導之間的邏輯連結，並企圖揭示臺灣在不穩定外交語境中維持主體性與戰略彈性的實踐路徑。本文將依據此架構展開後續分析，以檢視各構面如何互動，並實際形塑出臺灣在川普式外交語境下的戰略位置與回應可能性。

圖 1

研究架構概念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圖 1 呈現出本文以「川普外交的交易邏輯」作為核心自變項，指涉美國對外政策不再依循制度承諾與價值同盟，而是轉向以利益交換為核心的談判導向。在此脈絡下，「美國對台制度承諾」作為中介變項，連結川普外交語境與臺灣戰略感知之間的因果橋梁。一旦制度承諾的穩定性若受到削弱，將導致臺灣對外部安全保障的信任基礎動搖，進而影響其「戰略風險認知」，是本研究設定的依變項。具體而言，制度鬆動將使臺灣對區域情勢的判斷更加悲觀，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威脅升高，以及美方支援不確定性加劇。此外，本文以「臺灣避險行動策略」作為調節變項，將干擾制度承諾對風險認知的影響強度。若臺灣採取多元結盟、強化自主防衛、或尋求新興合作對象，則可能減緩制度退位所造成的風險感知上升；反之，若過度依賴單邊安全承諾，則此風險感知效應可能被放大。整體而言，本模型呈現出一套「由外交邏輯出發，經制度支撐再抵達認知層面，並受行動策略調節」的完整因果結構，具備高度政策解釋力與學理延伸性。因此，本研究根據圖 1 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一：川普政府的交易式外交邏輯越明確，越可能削弱美國對台制度承諾的穩定性。亦即當美國外交語言與政策更傾向交換性與代價化，制度性支持將轉化為可議價

的選項，導致承諾預測性與延續性下降。

假設二：**美國對台制度承諾的穩定性越低，臺灣對美國戰略風險的感知越高。**亦即制度承諾是盟邦形成安全信任的關鍵，中介機制顯示制度鬆動會引發臺灣對外交不確定性的焦慮與評估升溫。

假設三：**川普政府的交易式外交邏輯將間接提高臺灣的戰略風險感知，並透過制度承諾穩定性作為中介變項。**亦即外交語言並非直接影響風險感知，而是透過制度鬆動的路徑轉化而成。

假設四：**臺灣採取的避險行動策略會調節制度承諾與風險感知之間的關係，強化或弱化該關聯。**當臺灣實施更多元外交、經貿重組與安全自籌等避險行動時，可能降低制度鬆動對其風險認知的衝擊。

肆、研究分析

本研究在該部分係依據前述理論架構，針對四個核心變項進行脈絡分析，說明川普交易式外交邏輯如何透過制度承諾的鬆動影響臺灣的戰略風險認知，並探討臺灣如何以避險行動作為調節策略，因應制度不穩所帶來的風險感知升高。全章這部分分別為：一、川普語言的交易邏輯與承諾解構；二、制度鬆動的實踐與台美關係再定義；三、風險敘事的浮現與戰略主體的焦慮；四、避險行動的調節效果與風險回應邏輯。

一、川普語言的交易邏輯與承諾解構

總統語言不僅具象徵功能，更可實質塑造政策風向與制度行為的合法性框架，當總統偏離制度語境的語言結構時，會產生政策訊號的混淆與治理一致性的挑戰（Campbell & Jamieson, 1990）。而川普外交語言展現出強烈的計價邏輯，將安全承諾由制度性保證降格為雙邊可交易籌碼。他對「是否防衛臺灣」的公開談話中，多次強調成本－效益考量（Buckley, 2024），顯示制度語言已轉向市場語言。其語言結構反映出三重傾向：其一，承諾語言的可逆性；其二，盟邦地位的條件化；其三，制度穩定性的解構化。這樣的語言轉向不僅顛覆了既有的外交話語規則，更打破了盟邦間對制度性保障的預期信任。語言不再是保障承諾的機制，而成為重新評價國際關係與利益交換的場域。此一語言策略的轉變，實際上重新塑造了承諾的邊界與外交行動的彈性，亦隱含風險治理的再定義邏輯。顯然，這種語言邏輯不再傳遞穩定預期，而形成「模糊－重議價－再定價」的語法循環，造成盟友間資訊不對稱與角色焦慮。對臺灣而言，語言轉向並非僅為話術問題，而是重構其國際位置的權力工具。外交語言遂成為風險生成的第一波訊號。

這一風險生成的語言機制，不單是修辭層次的漂移，更是制度行動邏輯的轉化。當語言成為外交策略的前線工具，其所傳遞的價值訊號與政策傾向，實際影響國際角色的再定義。語言與制度之間的斷裂，使外交承諾逐漸朝向可量化、可標價的談判條件傾斜。延續此一語言策略對制度架構的衝擊，可以觀察到川普所採取的外交邏輯，並非偶發性的言語風格，而是形構外交實踐的結構性破壞模式。顯然，川普外交邏輯並非僅為領導人風格，而是一種可操作、可觀察之制度破壞型行為模式。其核心在於將外交承諾轉化為談判資源，透過語

言策略將制度義務重新標價。根據本研究資料分析，川普在公開演說與政策實踐中反覆強調盟友「應支付防衛代價」（Hunnicut & Brunnstrom, 2025）、「美國保護不會是免費的」（Magraw, 2024），此語言框架直接瓦解原有制度性保障的道德基礎與信任前提。例如，針對臺灣的軍售問題，川普強調臺灣「奪走美國晶片生意」（Valentine, 2025）、「必須付出更多代價」（Davidson, 2025），不僅模糊承諾邊界，更使制度性關係朝向雙邊議價邏輯轉化。

這種交易語言的強化，導致美國對盟邦的制度性承諾產生去道德化、去正當性與去持續性的效果。語言上的承諾不再穩定，制度上的實踐亦日益斷裂。在此架構下，美國與臺灣間的安全互信關係被逐步轉化為「是否值得保護」的算計題。語言的去制度化，遂成為制度承諾鬆動的開端。要言之，這種語言結構的轉變，標誌著外交承諾邏輯從制度穩定滑向策略可議。當制度信任遭到侵蝕，盟邦間的角色協商便轉為利益衡量的場域。臺灣面對的不只是承諾的弱化，更是制度定位的動搖。在這種語言與制度雙重鬆動的情境下，安全政策需重新建構其正當性基礎與風險評估機制。最終，語言不只是現實的反映，更成為重新分配國際關係權力的前哨。

二、制度鬆動的實踐與台美關係再定義

川普第二任首年政府的對外政策實踐，逐步展現出美國制度性承諾由「集體保障邏輯」朝向「個別協商邏輯」轉化的傾向。傳統美國對台政策長期依循《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等制度性安排，維持模糊而穩定的安全支持架構。然而，在川普交易式外交語境之下，這些制度逐漸被條件式表述、利益掛鉤的語言風格，以及選擇性實踐所重塑。儘管這些制度形式仍未消失，但其功能已出現鬆動與變

異。目前可觀察到的現象，包括安全承諾表述的片段化、不連貫，甚至語意反覆，導致制度穩定性出現預期落差。軍售延宕、訪問層級起伏，以及對中國政策中再次強調戰略模糊的語言操作，皆不違制度原則，卻在實踐層面增添了不確定性與風險判讀的困難。本文並非意圖過早斷言制度結構已全面崩解，而是指出川普外交邏輯下，「制度」正被逐步功能化、條件化，轉化為可議價的策略工具。此一發展趨勢，值得臺灣在風險評估與戰略判斷中高度關注，亦凸顯制度信任的維繫已不再是可被預設的基礎前提。

儘管美國在川普第二任首年尚未退出北約（NATO），許多多邊安全與經貿協議在制度層次上仍持續有效，然其實質運作已逐漸出現弱化徵兆。川普總統在 2025 年 3 月 7 日在與歐洲盟國會晤時公開表示，若部分北約成員國未提升軍費支出，美國將不再無條件承擔北約防務的核心責任。此類發言雖未觸及正式退出條約，但已動搖集體安全承諾的制度穩定性與預期基礎。同樣地，在貿易領域中，美國雖未退出《美墨加協定》（USMCA），卻以經濟利益不均為由，向加拿大提出重談關稅架構之要求，並暗示可能暫停協議部分執行（Sorace, 2025）。這些實例顯示，川普政府即便形式上未廢除既有制度，卻透過政策操作與政治語言，將多邊機制逐步轉化為可議價的個別談判平台，導致制度承諾的集體保障邏輯弱化，逐漸轉向以領導人偏好與時機判斷為依歸的交換邏輯。

至於戰略模糊作為美國對中政策的核心架構，確實自冷戰以來即為長期存在的戰略設計，其目的在於維持地區穩定與威懾效果之間的動態平衡。然而，在川普第二任首年政府語境中，戰略模糊的延續已非僅止於制度性持守，而是被納入更廣泛的交易式外交邏輯中重新詮釋與操作。當總統個人言論頻繁以模糊、反覆乃至附加條件的

方式呈現，卻缺乏制度性澄清與政策協調機制時，將使原本具備穩定意圖的模糊策略，轉變為一種不穩定的語言風險來源。這種制度與語言之間協調斷裂的現象，不僅模糊了承諾本身的範圍與強度，也讓盟友難以從語言訊號中解讀具體政策走向，導致風險感知的負荷顯著上升。因此，本文所指之「風險感知」並非針對戰略模糊的歷史本質，而是針對其在當前交易語境下被去制度化、去連貫化後，所造成之理解困難與預測失效的現象。

事實上，原本依附於制度性架構中的台美關係，在交易式邏輯下必須透過「自證價值」來爭取關注與支持。臺灣不再是制度下的穩定變項，而被置於不斷需要再正當化的可議籌碼位置。這種制度定位的浮動，意味著台美關係需在不確定的語境中不斷尋求再認證。美國不再以制度性角色定位臺灣，而是要求其提出明確的戰略價值與實質貢獻。換言之，制度性承諾的空白，促使臺灣被迫展現出「值得信賴」與「值得投資」的形象。這使得臺灣在國防支出、經濟利益與地緣價值等議題上，逐漸納入以量化回報為主的評價系統（Gomez, 2025）。更進一步，制度鬆動不僅限於軍售與表述的不確定，也包括制度框架本身的靜默化。臺灣未能再從制度中獲取明確訊號，反而需要主動解讀模糊語境所釋放的隱性期待（Brands, 2018）。進而言之，制度不再是信任的穩固來源，而是由市場化邏輯驅動的動態談判場域。這對臺灣而言，能否在此交易式架構中維持其戰略主體性，將取決於其回應風險與重塑制度語法的能力（Davidson, 2025; Smith & Geddie, 2025）。

總結來說，制度鬆動的趨勢不僅改寫了承諾機制的運作方式，也改變了台美關係中角色定位的互動邏輯。當臺灣被迫在日益不穩定的語境中持續輸出戰略價值，其地位不再建基於既有政策架構所能

預設的穩定性，而需仰賴外交表現與政策回報來實質維繫。此一變化使得原本作為關係穩定依據的制度安排，逐步讓位於以利益衡量為基準的交涉機制。制度規範的影響力轉化為語言框架中的參照殘影，雙邊互動日益呈現出以實質交換為導向的再協商格局。在這種情境下，制度與語言之間的落差，開始重構彼此的互動邏輯與對風險的再認知機制。亦即，在川普第二任首年政策邏輯下，制度不再提供穩定預期的依靠，而僅為交易性政治的表演舞台。對臺灣而言，回應此種變化，不僅是調整政策工具的問題，更是重構自身戰略認同與對外敘事的必要。未來的外交布局，將勢必圍繞「如何在缺乏制度穩定的局勢中證明自身價值」與「如何透過實踐替代傳統保障結構」兩大課題展開。

三、風險敘事的浮現與戰略主體的焦慮

制度鬆動帶來風險敘事的浮現。臺灣無法再仰賴傳統「模糊－信任－承諾」鏈條對美國行為進行預測，轉而面對「模糊－解構－懸置」的斷裂結構。顯然，戰略風險認知因此升高，不僅體現在安全層面，也蔓延至經貿政策的不確定。這種風險不再來自單一的軍事威脅，而是由制度信任的萎縮所觸發的多重不安。當承諾轉為具體利益條件，制度保證便不再提供穩定預期，而是需重新詮釋的變動訊號。風險的語言因此與外交話語交織，成為一種策略性重組的工具。臺灣在此結構中，逐漸成為風險計算與議價的主體，而非受制度庇護的被動盟友。戰略焦慮遂從安全場域延伸至政策層面，導致對外交回應的準備與選項出現劇烈壓縮。

事實上，在川普政府語言策略不斷去制度化的背景下，風險不再僅為突發事件的回應對象，而是制度性沈默中持續累積的結構性焦

慮。當軍售延宕成為常態，當經濟政策變得充滿臨時性與交易性，臺灣決策圈逐漸無法從傳統信號中解讀未來走向（De Guzman, 2025）。風險敘事逐漸成為主導外交語境的框架，並滲透進臺灣的公共論述與政策溝通中。這不僅使國安戰略難以形成穩定規劃，也壓縮外交資源的有效配置空間。換言之，制度鬆動所釋放的不確定性，正在重塑臺灣對未來的風險知覺與國家行動模式。當制度語言無法提供穩定的預期依據，臺灣在戰略判斷上日益倚賴主觀推演與情境模擬。風險治理逐漸轉向一種高敏感度的預警式操作，而非依循制度訊號的被動回應。此一轉變反映出臺灣外交思維的再調整，也凸顯其在全球不確定秩序中的角色重構困境（Buckley, 2024）。

在這樣高不確定性與制度靜默並存的情境中，臺灣對自身國際位置的判斷與調整開始呈現出結構性的焦慮反應（Wu & Lin, 2019）。外交行為不再依循既定制度或盟邦信號，而須從模糊語境中擷取潛在風險意涵。這種風險解讀的主觀化趨勢，使得決策者更依賴情境預判與政治語感，而非制度保證。於是，戰略焦慮逐漸具象化為一種結構認知與角色不安的交錯現象，深刻牽動政策路徑的選擇與定位。而臺灣的戰略焦慮主要聚焦於三點：一為「是否被視為值得保護的對象」的價值落差；二為外交身份被重新定義的角色不安；三為制度承諾靜默下的未來空間萎縮（Gordon et al., 2023）。這些風險敘事不僅重塑臺灣的主體性，也深刻影響其政策想像與選項結構。

當戰略焦慮逐步累積為認知結構的偏移，風險感受開始不再僅侷限於特定事件或政策，而擴展為對整體安全架構與外交承諾穩定性的質疑。在此脈絡下，風險敘事作為集體意識中的預設模式，開始滲透並重構政策判準與行動動能。而制度鬆動所引發的最深層效應，在於戰略風險敘事的浮現與臺灣主體性的焦慮升高。在風險敘事逐

漸成為政策溝通主旋律的背景下，制度承諾的模糊與可議價化，進一步削弱了對未來局勢的可預測性與信賴基礎。這種制度失語與話語漂移交織的情境，不僅加劇臺灣對國際環境的焦慮，也迫使政策制定者在模糊性中尋找穩定的策略定位。故此，根據風險社會理論，制度信任的瓦解會導致風險認知的放大效應（Bearth & Siegrist, 2022）。而臺灣決策圈與輿論場域中，逐步浮現對「美國會否背棄臺灣」的焦慮，轉化為國防預算壓力、外交行動遲滯與政策不確定性的升高。例如路透社在 2025 年 4 月 4 日報導提及，與美國高層接觸的臺灣外交官與政府代表，正面臨接續訪問層級延宕與協商語境模糊的挑戰，如原先預期的國會訪團或高層互動頻率下降，部分外交行程因未確定美國政策基調而暫緩，導致整體外交策略出現拖延與猶豫，反映出臺灣政策圈對於美國政策一致性的信心不足（Apps, 2025）。2025 年 5 月 30 日，路透社報導指出，臺灣政府在 2025 年提增加國防預算幅度（約 19 億美元），部分美國官員甚至在幕後提醒臺灣反對黨不要阻擋此一提案，視其為國家安全生存問題（Martina et al., 2025）。美國 RAND 公司在 5 月 26 日的分析文章指出，臺灣決策圈內部（包括政策智庫及政府相關顧問團體）對川普第二任首年的不確定政策走向表現出明顯擔憂，並將這種不安稱為「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焦慮」（strategic anxiety），這類焦慮在政策簡報與智庫評估中反覆出現，表明對制度穩定性的信任有所動搖（Blanchette & DiPippo, 2025）。

此種戰略焦慮的擴散，不僅反映出制度功能失效後的心理預期位移，也突顯語言承諾無法支撐安全穩定的結構困境。當制度不再被視為風險緩衝器，而淪為不確定性的生成場，風險即成為外交判斷的核心變數（Katzenstein & Seybert, 2018）。然而，臺灣在此語境中，愈來愈仰賴主觀預測與情境演繹，以彌補承諾斷裂所產生的認知落

差。這也使風險敘事從單一事件的回應邏輯，演變為制度性失效的認知結果與政策前提。這種風險敘事的生成，是川普外交語境下的制度性再定義過程。制度不再提供可預測的保障，風險感知遂轉化為國家行為的主導因素。臺灣作為非正式盟友，過度依賴語言承諾與象徵性制度的結構弱點，正是此一風險放大的核心根源。要言之，在缺乏制度錨定（institution-anchored）情況下，戰略穩定日益取決於主觀信號之詮釋與政策靈活性的即時反應。臺灣若欲維持其戰略主體性，需主動建構具備回應彈性與預警能力的外交架構。否則，其國際角色恐將隨制度語境的轉移而陷入日益邊緣的談判位置。

而川普式外交語境所揭示的，不僅是語言與制度脫鉤的現象，更是一場關於「信任生成機制」的結構轉換。當制度不再作為穩定的信任中介，行為者的風險認知與政策選擇便被迫回歸到主觀詮釋與政治情境的即時互動中。此一轉變使臺灣的外交決策邏輯由「制度依附」轉向「訊號依附」，也使戰略焦慮成為治理常態的一部分。本文認為，唯有重新建立以制度化預期為核心的風險治理機制，並將模糊的語言轉譯為具操作性的政策框架，臺灣方能在不確定的國際秩序中，恢復策略穩定與主體能動的平衡位置。此一結構轉換同時揭示出小國在權力非對稱體系下的生存邏輯。當語言與制度的連結被削弱，信任不再是一種靜態的結果，而成為需持續再生產的政治過程。臺灣的挑戰，不在於消除模糊，而在於如何以制度設計馴化模糊，使不確定性轉化為策略彈性。唯有如此，臺灣才能在變動秩序中維繫行動自主，並在風險之中找到安全感。

四、避險行動的調節效果與風險回應邏輯

在川普交易式外交邏輯主導下，語言模糊與制度失語成為風險認知升高的關鍵觸媒。臺灣面對此一結構性不確定性，逐步展開多層

次的避險行動，涵蓋與非美民主國家的安全合作強化、供應鏈重組以分散對單一強權的經濟依賴、以及積極爭取如 CPTPP 等區域機制的制度性嵌入。這些行動展現出臺灣作為國際行動者在高不確定情境下所具備的回應彈性與主體意志。同時，這些避險行動亦反映出臺灣外交戰略邏輯的轉型，即從制度依賴轉向多元分散的韌性建構（吳崇涵，2025）。透過分散風險與增加制度嵌入點，臺灣得以在盟友承諾不穩時維持政策主動性。此一調節策略不僅回應制度鬆動的挑戰，也形塑出臺灣作為次級強權的外交適應能力。

然而，避險行動的展開不僅是外交手段的多元化，更具有深層的理論意涵。其在制度鬆動與風險上升之間，扮演著調節與再平衡的結構角色（Kuik, 2021）。避險行動能否轉化為制度性能力，不僅關乎策略成效，更關係到臺灣是否具備在權力縫隙中自我定位的能力與韌性基礎。故此，本研究定位「避險行動」為調節變數，旨在釐清其如何於制度承諾鬆動與風險認知升高之間，發揮緩衝與轉化作用。要言之，避險策略是否成熟與多元，將決定臺灣風險感知是否轉化為被動焦慮，抑或激發出具戰略自主性的行動配置。若臺灣能夠成功內建制度性預警與角色自我界定機制，則可在外交語言變調與制度信號斷裂的雙重壓力下，維持其戰略主體性與安全穩定的自我邏輯。反之，若避險策略薄弱，則臺灣愈可能淪為大國談判中的「可交易對象」，喪失制度護欄與戰略回應空間。

在此基礎上，避險行動不再只是應變式操作，而逐漸形構為制度鬆動後的策略性回應模型（Gonzalez-Pujol, 2024）。其功能已超越戰術層次，轉化為國家風險治理架構中的關鍵節點。唯有透過實證觀察與策略拆解，方能檢驗其是否具備實質的調節效果與制度穩定功能。要言之，在制度鬆動與風險認知升高的雙重壓力下，臺灣能否透過避

險行動進行調節，成為本研究核心探問。研究結果顯示，避險行動確實可作為制度斷裂與風險感知之間的緩衝機制。臺灣近年積極深化與日本、澳洲等國的安全合作，推動供應鏈多元化，並參與如 CPTPP 等多邊機制，皆屬此一調節邏輯之具體實踐。故此，在避險行動逐步制度化的過程中，其效果不僅取決於策略本身的設計，也深受國際環境動態與地緣風險變化所牽動。特別是在美中關係對立加劇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背景下，臺灣的避險策略面臨更高的適應壓力與時效要求。避險若僅止於短期部署，將無法有效內建於國家安全與外交決策的長期規劃中。唯有使其成為可調度、可預期且可持續的制度機制，方能真正發揮調節與支撐功能。此外，避險策略的主體性亦須由「回應強權」轉化為「塑造環境」，才能跳脫被動應對的結構困境。這意味著臺灣必須在既有制度鬆動的縫隙中，重新界定自身的角色與價值。透過策略明確化、資源整合化與制度規則化，避險方能從外交應變升級為國家戰略。也唯有在這樣的條件下，臺灣才能確保其戰略主體性不因外在變局而持續稀釋。這正是小國在風險社會下維繫自主空間所需面對的核心挑戰與實踐課題。

質言之，隨著這些具體實踐逐步深化，避險行動亦從策略操作轉化為制度性迴應模式的核心構件。其所發揮的調節功能，不僅在外交場域中創造出新的行動空間，也在風險治理的架構中重新定義了臺灣的戰略選擇權限。進一步來看，這些行動效果可從功能面向被具體拆解與分析，揭示其實際調節力道與制度穩定作用。事實上，本研究所提之避險行動作為調節效果可體現在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對單一制度承諾來源的依賴程度；其二，重建外交選項與政策韌性的可能性；其三，提升風險治理的主體性與能動性。顯然，避險策略不僅為政策技術選擇，更是面對制度風險時的行動邏輯轉向。儼然已成為制

度鬆動語境下的關鍵回應框架。其成敗與否，將深刻影響臺灣在變動國際秩序中定位自身的能力與持續韌性。

進而言之，臺灣當前的避險行動已展現出一定的調節與回應能力，但仍處於由策略性分散邁向制度性整合的過渡階段。避險的最大挑戰，不在於行動的缺乏，而在於如何將多點式的應變，轉化為具一致節奏與可預測性的治理架構。換言之，唯有當避險策略能內嵌於國家安全與外交決策的制度程序中，形成跨部會協調、政策傳導與資源分配的常態機制，方能真正發揮穩定風險預期與維持戰略韌性的功能。然而，臺灣的不安並非源自避險的失效，而是制度化成熟度尚未足以抵銷外部承諾鬆動的傳導效應。當川普式交易外交使制度承諾轉向可議價化，臺灣雖以行動積極回應，仍須面對語言信號不對稱與夥伴吸納力差異的挑戰。因此，避險策略的下一步，不僅是持續擴大多邊參與或分散依賴，更需強化「制度信任重建」的內在基礎，使其從外交應變升級為國家治理的長期韌性機制。唯有如此，臺灣才能在交易式外交語境中穩定自身的戰略角色，並確保其風險調節行動具備永續性與可預期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一～四研究分析，呈現川普交易式外交邏輯所引發的制度承諾鬆動，已對臺灣構成深層的戰略風險壓力。然而，臺灣並非毫無因應之道。唯有深化避險行動策略，方可有效調節風險感知升高之鏈結強度，維持國家在地緣不確定性中的主體地位與決策彈性。當前外交語境的結構變遷，已使傳統制度保障的穩定性失效，轉而依賴行動者的策略調節能力。臺灣若欲維持其國際地位與政策能動性，需在語言不確定與制度斷裂的雙重壓力中建立可持續的外交韌性。避險行動之所以關鍵，不僅在於其回應風險，更在於其為制度失語提供一種實踐性語法。最終，唯有從制度調適走向策略

創構，臺灣方能在川普式交易邏輯主導的國際局勢中，確保其戰略主體性不致邊緣化。進一步來說，川普的交易式外交邏輯，不僅改變了國際政治中的制度運作預期，也加劇了既有體制內部行動者對制度承諾的理解分歧。特別是在美國國內的外交決策圈中，MAGA 派與建制派之間，對於制度可預期性與同盟信任的基本信念產生根本落差。

這種分歧不僅反映於對外政策語言的一致性崩解，更擴散至對盟邦關係的承諾認知，進而形塑臺灣等第三方行動者的風險感知與回應分歧。因此，本文在處理異質性問題時，亦將「川普交易式外交」視為一項造成制度語境破碎化的結構性背景變項，為後續的制度鬆動與風險再認知提供解釋基礎。本文並非預設這些異質群體可被整合為單一類型，而是以「脈絡敏感性」的質性取向，處理異質主體的風險認知與外交語言理解方式的差異性。本文意在捕捉這些行動者在不同制度鬆動階段中，如何調整其風險感知與回應語彙。這些個體雖屬同一「決策圈」範疇，然其組織背景、制度位置與對美國的預期機制各異，本文即透過語料脈絡分析，辨識其敘事邏輯的異同與演變。由此，異質性非為分析的障礙，而是理解「風險敘事」與「避險策略」生成邏輯的素材來源，反而更能凸顯小國行動者如何在不確定結構中形塑其語言與認知的反應座標。

伍、討論

本研究以川普第二任首年之交易式外交邏輯為分析起點，建構一套由四個核心變項構成之理論架構，藉以解析制度承諾鬆動如何誘發臺灣戰略風險認知升高，並進一步觀察避險行動策略於其中的調節效果。在「研究分析」章節中，本文已分別就川普外交語言的轉

向、制度承諾的實踐弱化、風險敘事的浮現與避險策略的回應邏輯進行層層拆解。本節將回應研究假設，並整合各構面間的交互效應，從而對臺灣在新型外交語境下的風險治理提出理論反思與政策建議。

一、交易式外交邏輯對制度承諾穩定性之侵蝕效應

研究假設一認為，川普政府的交易式外交邏輯越明確，越可能削弱美國對台制度承諾的穩定性。研究發現此假定獲得強力支持。川普政府反覆強調「成本－效益」邏輯，將安全承諾轉化為具體可議價的政治資產，並以此語言策略解構傳統制度承諾的穩定性基礎（Buckley, 2024; Davidson, 2025）。語言上的「付費式承諾」與「防衛應有代價」表述，逐步取代過往以信任與共享價值為核心的制度語彙，導致制度語言之功能性轉變（Magraw, 2024; Hunnicutt & Brunnstrom, 2025）。尤有甚者，此種語言並非空泛表態，而透過軍售延宕、對台訪問層級波動及政策主張的反覆等行為具體實踐，進一步使制度承諾喪失預測性與一致性（Gomez, 2025; Yang & Wu, 2025）。此一發展顯示，川普外交邏輯不僅挑戰傳統制度主義對承諾穩定性的理解（Keohane, 1988; Ikenberry, 2001），也促使盟邦角色需透過「再標價」（re-pricing）來爭取政策關注（Smith & Geddie, 2025）。制度的拘束力與約束力在此外交語境中明顯削弱，美台關係因此由制度型保障滑向策略型交換邏輯，亦即本文所提之「交易式模糊外交」框架。此一外交語法的轉向，使得制度承諾逐漸成為語言上的象徵資產，而非實質的行動約束，亦為風險傳導機制埋下結構根基（Gonzalez-Pujol, 2024; 吳崇涵, 2025）。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政策圈與市場觀察者逐漸將此種高度交易化、反覆調整立場的外交風格，概括為所謂「TACO 的川普」（邱祐慶, 2025），亦即在強烈語言施壓後往往伴隨策略性退讓或重新談判。此一操作模式雖未必立即改

變具體政策結果，卻在反覆試探與回撤的過程中，加深盟邦對美國承諾可預測性的疑慮。

二、制度承諾穩定性與風險認知的正向連動關係

根據假定二，制度承諾穩定性愈低，臺灣對美國戰略風險的認知愈高。本研究亦證實此假定成立。川普政府的外交實踐凸顯出制度訊號的破碎化與決策任意性，導致臺灣無法從既有制度架構中獲得可預期性之政策依據（Brands, 2018; Davidson, 2025）。戰略模糊原本依賴於制度保障作為其可運作前提（Jervis, 2017; Schelling, 2014），而當制度本身失去穩定性與一致性時，模糊即轉化為任意性、不可預測性與戰略焦慮的來源（Ashford & Kroenig, 2020）。特別是在川普多次表態「是否協防臺灣須視回報而定」之語境中，臺灣決策圈對美國承諾的信任基礎迅速崩解，並轉化為對被犧牲或邊緣化的風險敘事（Buckley, 2024; Hunnicutt & Brunnstrom, 2025）。此現象不僅限於安全層面，亦延伸至經貿領域。川普政府對台加徵 32% 關稅，即便半導體產品後續獲得豁免（Blanchard, 2025），然其「晶片利益掠奪論」語言（如稱臺灣「搶走美國生意」）仍對台美經貿關係之制度信任構成深層衝擊（Valentine, 2025）。此種跨領域制度鬆動的累積效果，使得風險認知從安全轉向多面向政治經濟場域，並造成國家決策層面上對未來局勢的焦慮與不確定感升高（Bearth & Siegrist, 2022; Wu & Lin, 2019）。

三、制度鬆動作為川普外交與風險認知之間的中介路徑

研究假設三主張，川普交易式外交對臺灣戰略研究假設風險認

知的影響，乃透過制度承諾穩定性下降為中介機制間接產生。本研究對此假定提供具體佐證。分析顯示，外交語言的轉向雖不必然直接引發風險焦慮，但一旦該語言被制度行動所印證，便形成可觀測的制度斷裂現象（Ikenberry, 2020）。而此斷裂將臺灣對未來政策的預期由「制度性預測」轉向「語言式解讀」，形成一種資訊不對稱與風險過度解釋的惡性迴圈（Katzenstein & Seybert, 2018）。換言之，風險感知並非源自單一語言訊號，而是制度缺席與語言不一致所共同導致的認知模糊化現象（Kuik, 2021）。川普語境下的政策不連續性、軍售語焉不詳、與對中表態反覆等，都強化此一中介機制的效果（Davidson, 2025）。制度之鬆動遂成為外交語言對風險認知影響之必要條件與關鍵路徑，進一步支持本文將「制度承諾穩定性」視為中介變項的理論設定。

四、避險行動作為制度斷裂與風險認知之調節變項

本研究所提出之第四項研究假設，即避險策略將調節制度承諾鬆動與風險認知之間的關係，亦獲得實證觀察支持。臺灣近年積極推動多元外交佈局，包括強化與日、澳、歐盟等國之安全合作對話，深化 CPTPP 參與機會，以及在供應鏈政策上推動對中與對美的雙重風險分散（Daniels, 2024; 吳崇涵, 2025）。此等行動策略顯示臺灣外交已逐步由制度依附型，轉向具備分散化與韌性建構的主動因應結構。研究觀察亦指出，當臺灣避險行動具備主動性、制度性與多邊化特徵時，風險感知雖不會完全消弭，卻可有效緩衝制度鬆動所帶來的衝擊強度。此亦印證 Goh（2005）、Kuik（2021）等學者對小型國家避險策略的實踐意涵，亦展現出臺灣外交戰略之內建彈性與結構調適能力。Weitsman（2004）、Vander Venet 與 Salman（2019）曾

指出，避險策略之成敗，關鍵在於是否能建構制度性備援機制與擴展多邊互動網絡，以降低對單一安全來源的結構性依賴。若避險行動缺乏延續性、缺乏制度性支持或受限於單一外交依賴，則制度鬆動之影響將難以緩解，風險認知將呈現指數式上升，進一步削弱政策制定之穩定性與空間彈性。

綜合而言，本文上述之一～四研究假設皆獲初步支持（表 1），所建構之理論架構具有實證連貫性與理論解釋力。川普交易式外交邏輯已非短期政策偏好，而是一套重構制度信任與風險感知的語法系統。臺灣若欲維持其戰略主體性，須不僅理解此一外交邏輯如何運作，更應積極建構多元調節機制，強化語言轉向之預警系統與風險認知的回應能力。未來相關研究可進一步延伸至跨政權比較與跨語境案例分析，以檢視此外交邏輯在不同制度條件下的風險生成效果與國家回應策略的差異性。畢竟，語言的轉向不只是訊號變異，更牽動制度秩序的重構。而避險策略的設計，也不應僅限於技術層次，而須上升至國家治理結構的核心命題。唯有將風險治理視為戰略穩定工程的一部分，臺灣方能於模糊與鬆動的交錯時代中，自我定位並持續發聲。

表 1
研究假設與實證支持整理表

	研究假設	研究發現摘要	支持／ 不支持
1	假定一：交易式外交削弱制度承諾穩性	川普語言與政策行動皆強化交易邏輯，導致制度承諾轉化為可議價選項。	支持

2	假定二：制度穩定性降低提升風險認知	制度斷裂使風險認知由安全領域擴散至經濟與外交場域，進而造成風險感知升高。	支持
3	假定三：制度承諾為語言與風險之中介	外交語言影響需透過制度鬆動為路徑，形成資訊不對稱與認知模糊。	支持
4	假定四：避險行動調節制度與風險關係	多邊避險行動具緩衝效果，惟若策略薄弱則無法抵銷制度失效衝擊。	支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陸、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以台易中？」作為問題引介，不僅反映臺灣在川普交易式外交語境下可能面臨的「被交換」、「角色邊緣化」的戰略風險，也隱含對其外交主體性是否仍能自主維持的疑問。此一提問既是對當前地緣結構重組下國家地位再定位的思辨，也是對制度信任崩解下風險治理能力的深層探問。藉由系統建構「外交語言－制度承諾－風險認知－避險行動」的分析鏈條，本文回應了這項提問，指出臺灣並非僅是交易的對象，而是透過調節行動試圖重建自主回應能力的能動行為者。這項理論假設與實證支持，提供邏輯清晰的辯證回應，也揭示臺灣在不確定性中尋求穩定角色之努力與侷限。研究結果驗證四項假定皆具實證支撐性，並透過質性脈絡分析方法，呈現外交語法如何成為地緣政治風險的源頭語境與制度功能重構的前導機制。

首先，本研究證實川普式「交易外交邏輯」已不再是領導人個人

的政策偏好，而是一種可操作、可觀察且具制度性破壞特徵的外交語法結構（Adamson & Greenhill, 2023; Mearsheimer, 2019）。此語法體系透過「代價化」、「去制度化」與「角色重議價」等策略，使制度承諾從過去的集體保障，轉化為具可變性與議價空間的交易工具。對臺灣而言，制度信任的崩解意味著其安全架構從「信任－制度－保護」轉為「語言－代價－不確定」，為臺灣戰略主體性與政策規劃帶來深遠衝擊。

其次，本研究確認制度承諾穩定性為風險認知的重要中介機制。可見，制度若缺乏延續性、一致性與可預測性，將導致盟邦無法從外交語言中獲取穩定政策信號，轉而陷入過度詮釋與焦慮推演的認知狀態（Fearon, 1997; Katzenstein & Seybert, 2018）。這種制度語言落差，特別在川普反覆的安全承諾語言與軍售行為中明確顯現（Buckley, 2024; Gomez, 2025）。制度的不穩定不僅影響安全領域，更延伸至經濟與科技戰略，形成跨領域風險敘事的擴散效應。

第三，避險行動被證實可調節制度鬆動與風險認知之間的強度關係。是以，臺灣透過多元外交布局、供應鏈重組、及多邊機制參與，展現出高韌性的風險應對能力，亦反映其外交從制度依賴邁向策略自主的結構轉型（Goh, 2005; Kuik, 2021; Weitsman, 2004）。避險策略已不再只是政策應變工具，更成為重構安全邏輯與擴展戰略選項的重要框架。其成功與否，不僅取決於外交技巧，更關乎國家制度性調適能力與角色自我界定的意志（Kuik, 2024）。

第四、未來研究可延伸本架構至他國案例（如烏克蘭、以色列、南韓）進行跨國比較，或進一步納入量化調查與媒體語料庫分析，檢驗「語言－制度－風險」鏈條之外在表徵機制與輿論反饋效果。而研究亦可進一步探索次級國家如何透過「敘事回應策略」重建其國際信

任定位，特別是在承諾語境不穩的權力縫隙中維持主體敘事。亦具備延伸至 AI 語言模型進行外交語言預測之潛力，有助於發展國際風險的演化監測與預警機制。若能納入歷史承諾重構與制度記憶分析，亦可補足既有研究對外交承諾「時間深度」之忽視。

總體而言，本文強調外交語言的變化不僅是溝通風格的改變，更可能深刻重塑制度信任邏輯與國家風險感知模式。而本文所關注的外交語言變化，並非單指話語修辭或個人風格的差異，而是強調語言在外交實踐中所扮演的制度指標功能。當語言邏輯從制度性承諾轉向交易式語彙，其所傳遞的訊號便可能動搖既有的信任機制，進而重構臺灣對安全穩定性的主觀認知。具體來說，本文並不認為外交行為整體已然轉型，而是指出語言變異所映射的制度鬆動風險，正是風險感知鏈條啟動的前兆。此一語言位移現象，並非發生在權力真空狀態中，而是伴隨全球權力重組與制度信任斷裂的趨勢共同展開。語言所映射的制度鬆動，恰恰反映出地緣政治不確定性正從語句層次滲透至政策判斷與國家行動。也因此，本文進一步指出，在當前風險升溫的國際環境下，小型國家更須警覺語言轉向所帶來的結構性警訊。

故此，在全球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升高的當下，理解此一外交語法轉向及其風險傳導效果，對於提升小型國家之戰略能動性與政策預警能力，具有高度理論啟發與實務貢獻價值。特別是在川普第二任首年交易式外交邏輯重新成形之際，臺灣作為美國盟邦卻非條約國的特殊地位，使其風險認知格外敏感，亦更仰賴語言與制度訊號之穩定。本文證明，制度承諾的語義變化，實際會透過「再標價」與「語言漂移」影響國家安全感知與外交決策基礎。交易式語法不僅重構了承諾與利益的邏輯，也動搖了台美互信的核心支柱。是以，本文所建構的「語言－制度－風險－避險」鏈條，不僅是對川普外交模式的再

詮釋，更提供評估臺灣未來戰略處境的操作框架與政策警訊。

值得說明的是，本文並不認為川普政府已全面動搖美國外交體系的制度基礎。相反地，川普時期許多政策仍受法院裁決、國會制衡與建制派閣員的調節，顯示制度本身具備一定的延續性與修復力。本文關注的重點不在於制度是否實質瓦解，而是語言邏輯與外交語法的變化如何干擾制度承諾的穩定解讀，使臺灣等非正式盟友對安全保障的認知基礎出現預期裂縫。在此意義上，風險的生成來自於語言與制度之間的落差，而非政策本身的斷裂；更具體地說，是外交語言所釋放的交易化訊號，促使制度信任出現鬆動跡象，進而引發風險敘事與避險行動的啟動。本文即是從此一認知動態出發，建構風險感知與回應策略的分析框架。

在此框架下，結構性的影響不僅是單一政策工具是否變化，而是政策語言、治理架構與制度期待如何在時間軸上互相塑造、互動與調整。從交易式外交的視角來看，語言敘述與政策焦點的變化往往源於策略性權衡與情境需求，而這種語境調整會影響外界對承諾是否穩定的判讀，而不是簡單地由政策本身的核心目標是否改變來判定穩健性。當政策語言在不同場合或文件中強調不同的價值或優先順序，這種重點置換可能在語義層次上造成斷裂感，尤其是在缺乏恆常性語言錨點的情況下，臺灣的風險認知就容易受此影響而出現偏差。而結構性影響主要體現在語言與制度之間的互動關係如何重構期待與判斷，這種互動會演化出臺灣決策圈對安全承諾可預測性與可信度的再評估，而不是單純因為某個政策細節改變就意味著結構性崩解。

進一步來說，交易式外交語境下的變動主要體現在語言與政策焦點的調整，這種調整有時可能反映在公開文件、談話語氣或優先次

序上，但不必然等同於核心承諾的根本性改變。對臺灣而言，這樣的變動會被感知為不確定性風險的一部分，因為在交易式外交邏輯裡，政治語言與談判語境的彈性可能放大對未來支援可預測性的疑慮，進而影響臺灣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任判斷與風險定價。因此，結構性影響不在於單一政策是否改變，而是政策在不同治理層級的動態互動如何重新塑造臺灣對盟友承諾的理解與風險評估，這正是本文在進行風險再評估時所要揭示的核心論點。

參考文獻

- 王文承（2025）。美中談判若陷僵局 台灣恐淪交易籌碼？專家揭 2 劇本：結局都不樂觀。SETN 三立新聞網，6 月 9 日。https://inews.setn.com/news/1669314 [Wang, W.-C. (2025). Mei zhong tanpan ruo xian jiangju Taiwan kong lun jiaoyi chouma? Zhuanjia jie 2 juben: Jiejue dou buleguan. SETN Sanli News Network, June 9.]
- 王信賢（2022）。美國《台灣政策法案》與兩岸關係。遠景論壇，（84），1-3。[Wang, H.-H. (2022). Meiguo “Taiwan Zhengce Faan” yu liangan guanxi. Prospect Forum, (84), 1-3.]
- 外交部（2026）。外交部歡迎並感謝美國國務院發布聲明關切中國對台軍演破壞區域和平穩定。外交部北美司，1 月 2 日。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121427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26). Waijiaobu huanying bing ganxie Meiguo Guowuyuan fabu shengming guanqie Zhongguo duitai junyan pohuai quyu heping wending. Department of North American Affair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2.]
- 吳玉山、傅澤民（2022）。霸權與挑戰：國際關係理論的詮釋。問題與研究，62（1），1-45。[Wu, Y.-S, & Fu, Z.-M. (2022). Hegemony and challenge: An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ssues & Studies, 62(1), 1-45.]
- 吳崇涵（2025）。美國戰略清晰化與臺灣避險策略。問題與研究，64（3），51-79。[Wu, C.-H. (2025).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larity and Taiwan’s hedging policy. Issues & Studies, 64(3), 51-79.]
- 宋學文（2022）。拜登政府對「一中政策」之問題界定及議程設定之研析。戰略安全研析，（175），68-80。[Sung, H.-W. (2022).

Baideng zhengfu dui “yizhong zhengce” zhi wenti jieding ji yicheng sheding zhi yanxi. *Journal of Strategic and Security Analyses*, (175), 68-80.]

李瑋萱 (2025)。美方 3500 億對台軍售有變數？軍事專家揪「名單」藏玄機：川普跳票不意外。風傳媒，12 月 27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11090962> [Li, W.-H. (2025). Meifang 3500yi duitai junshou you bianshu? Junshi zhuanjia jiu “ming dan” cang xuanji: Chuanpu tiaopiao buyiwai. *The Storm Media*, December 27.]

周旭華 (2010)。多邊貿易談判的政治脈絡：國際關係理論作為 WTO 政策研究工具之初探。東吳政治學報，28 (2)，153-205。[Chou, H.-H. (2010). Exploring political context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 Using IR theories as an analytical tool in WTO policy studies.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2), 153-205.]

林正義 (2024)。川普走出「戰略模糊」？遠景論壇，(41)，1-3。[Lin, C.-Y. (2024). Chuanpu zouchu “zhanlue mohu”? *Prospect Forum*, (41), 1-3.]

林宗弘、蕭新煌、許耿銘 (2018)。邁向世界風險社會？台灣民眾的社會資本、風險感知與風險因應行為。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40)，127-166。[Lin, T.-H., Hsiao, H.-H., & Hsu, K.-M. (2018). Approaching a world risk society? Social capital, risk perception and risk coping behavior in Taiwan. *Survey Research-Method and Application*, (40), 127-166.]

邱祐慶 (2025)。川普又「Taco」？中美稀土戰留伏筆，市場猜關稅「升級變降級」。遠見雜誌，10 月 13 日。<https://www.gvm.com.tw/article/124967?srsId=AfmBOoqYDEyW2YsdRP6z1UqfUqrV1xw>

ZJvRt7QZiuGq5vods9w0UTMUE [Chiu, Y.-C. (2025). Chuanpu you “Taco”? Zhong mei xituzhan liufubi, shichang cai guanshui “shengji bian jiangji”. *Global Views Monthly*, October 13.]

侯姿瑩 (2025a)。美媒：華府長年採戰略模糊 川普 2.0 對台政策如謎團。中央通訊社，3 月 9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03090013.aspx [Hou, T.-Y. (2025). *Meimei: Hhuafu zhangnian cai zhanlue mohu chuanpu 2.0 duitai zhengce ru mituan*. *Central News Agency (CNA)*, March 9.]

侯姿瑩 (2025b)。川普簽行政命令簡化對外軍售流程 將擬優先夥伴名單。中央通訊社，4 月 10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504100051.aspx [Hou, T.-Y. (2025). *Chuanpu qian hangzheng mingling jianhua duiwai junshou liucheng jiang ni youxian huoban mingdan*. *Central News Agency (CNA)*, April 10.]

侯姿瑩 (2025c)。美再對台軍售 國務院：對台承諾不變、籲中停止施壓。中央通訊社，12 月 20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l/202512200010.aspx [Hou, T.-Y. (2025). *Mei zai duitai junshou Guowuyuan: DduiTai chengnuo bubian, yu zhong tingzhi shiya*. *Central News Agency (CNA)*, December 20.]

翁履中 (2025)。「交易式外交」：川普 2.0 時代俄烏戰爭前景與全球變局。《展望與探索月刊》，23 (3)，28-34。[Weng, L.-C. (2025).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global shifts in the Trump 2.0 era. *Prospect & Exploration*, 23(3), 28–34.]

張文馨 (2024)。川普重申不付錢的盟友要靠自己 拒透露是否保衛台灣。聯合報，5 月 2 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OfHVhNyIw [Chang, W.-H. (2024). *Chuanpu zhongshen bufuqian de mengyou*

- yao kaoziji jutoulu shifou baowei Taiwan. *United Daily News*, May 2.]
- 張建一（2025）。美國將對臺灣的晶片課徵 100%關稅？**遠景論壇**，（12），1-4。[Chang, C.-Y. (2025). Meiguo jiangdui Taiwan de jingpian kezheng 100% guanshui? *Prospect Forum*, (12), 1-4.]
- 張登及（2013）。「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14（2），53-98。[Chang, T.-C. (2013). The impact of “rebalancing” on U.S.-China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ory and policy. *Prospect Quarterly*, 14(2), 53–98.]
- 許忠信（2014）。台灣關係法與台灣經濟安全。**台灣國際法季刊**，11（4），7-40。[Hsu, C.-H. (2014). TRA and Taiwan’s economic security. *Taiwan International Law Quarterly*, 11(4), 7-40.]
- 陳欣之（2011）。崛起、挑戰與承繼霸權－崛起強權參與建構國際制度過程的觀察。**問題與研究**，50（4），63-88。[Chen, H.-C. (2011). Rise, challenge, and transfer hegemony: The rising power’s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Issues & Studies*, 50(4), 63-88.]
- 陳筱涵（2025）。特朗普就職滿百日 美國智庫民調顯示台灣人對美國信任度大降。**法國國際廣播電台**，4月30日。https://www.rfi.fr/tw/專欄檢索/聚焦台海/20250430-特朗普就職滿百日-美國智庫民調顯示台灣人對美國信任度大降 [Chen, H.-H. (2025). Telangpu jiuzhi manbairi Meiguo zhiku mindiao xianshi Taiwanren dui Meiguo xinrendu dajiang.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RFI)*, April 30.]
- 黃安偉、Schmitt, E.（2019）。川普政府被指拖延對台軍售，遭兩黨質疑。**紐約時報中文網**，7月31日。https://cn.nytimes.com/usa/20190731/trump-taiwan-arms-china-trade-/zh-hant/ [Wong, E. &

- Schmitt, E. (2019). Chuanpu zhengfu beizhi tuoyan duitai junshou, zao liangdang zhiyi. *The New York Times Chinese-Language Site*, July 31.]
- 楊志恆 (2025)。川普上任總統新美中關係對兩岸關係發展影響。**遠景論壇**，(41)，1-5。[Yang, C.-H. (2025). Chuanpu shangren zongtong xin MeiZhong guanxi dui liangan guanxi fazhan yingxiang. *Prospect Forum*, (41), 1-5.]
- 趙明昊 (2022)。拜登政府印太戰略的新意與困境。**中美聚焦**，3月2日。http://zh.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20302/42544.html [Zhao, M.-H. (2022). Baideng zhengfu YinTai zhanlue de xinyi yu kunjing. *China-US Focus*, March 2.]
- 潘姿羽 (2025)。對等關稅關鍵談判期 專家：說教無用川普要的是承諾。**中央通訊社**，4月5日。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504050027.aspx [Pan, T.-Y. (2025). Duideng guanshui guanjian tanpanqi zhuanjia: Shuojiao wuyong Chuanpu yaodeshi chengnuo. *Central News Agency (CNA)*, April 5.]
- 鍾佑貞 (2024)。美學者：川普 2.0 強力貫徹個人意志 世界各國更知如何應對。**中央通訊社**，11月14日。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2411140045.aspx [Chung, Y.-C. (2024). Meixuezhe: Chuanpu 2.0 qiangli guanche geren yizhi shijie geguo gengzhi ruhe yingdui. *Central News Agency (CNA)*, November 14.]
- 鍾佑貞 (2025a)。美國國務院官網更新美台關係現狀 刪不支持台獨強調拒脅迫。**中央通訊社**，2月16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502160006.aspx [Chung, Y.-C. (2025a). Meiguo Guowuyuan guanwang gengxin meitai guanxi xianzhuang shan buzhi chitaidu qiangdiao juxiepo. *Central News Agency (CNA)*, February 16.]

- 鍾佑貞（2025b）。美議員提台灣關係強化法 AIT 處長比照大使由總統提名。中央通訊社，5 月 8 日。https://www.cna.com.tw/news/aip/202505080016.aspx [Chung, Y.-C. (2025b). Meiguoyiyuan ti Taiwan guanxi qianghua fa AIT chuzhang bizhao dashi you zongtong timing. *Central News Agency (CNA)*, May 8.]
- 羅致政（1996）。美國戰略性模糊政策對兩岸互動的影響。東吳政治學報，（6），175-202。[Lo, C.-C. (1996). The U.S. policy of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its impact on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 175-202.]
- 羅翊宸（2025）。川普稱南韓為「撈錢機器」！要求分攤高額軍費 韓派部長赴美協商。ETtoday 新聞雲，4 月 9 日。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50409/2939812.htm [Lo, Y.-C. (2025). Chuanpu cheng Nanhan wei “laoqian jiqi” ! Yaoqiu fentan gaoe junfei han pai buzhang fumei xieshang. *ETtoday News Cloud*, April 9.]
- Adamson, F. B., & Greenhill, K. M. (2023). Deal-making, diplomacy and transactional forced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99(2), 707-725.
- Ali, S. M. (2015). *US-China strategic competition*. Springer.
- Apps, P. (2025). Pacific braces for conflict, eyes uncertain US position. *Reuters*, April 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pacific-braces-conflict-eyes-uncertain-us-position-peter-apps-2025-04-04/
- Ashford, E., & Kroenig, M. (2020). Is thi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old war with China. *Foreign Policy*, July 3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7/31/is-this-the-beginning-of-a-new-cold-war-with-china/
- Bashirov, G., & Yilmaz, I. (2020). The rise of transnat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vidence from Turkey's relation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74(2), 165-184.
- Bearth, A., & Siegrist, M. (2022). 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 A normative perspective on trust? *Risk Analysis*, 42(7), 1381-1392.
- Beck, U. (2013). Living in and coping with a world risk society. In D. Innerarity & J. Solana (Eds.), *Humanity at risk: The need for global governance* (pp. 11-18). Bloomsbury.
- Blanchard, B. & Martina, M. (2025). US announces massive package of arms sales to Taiwan valued at more than \$10 billion. *NPR*, December 18. <https://www.npr.org/2025/12/18/nx-s1-5648080/us-arms-sales-taiwan-10-billion>
- Blanchard, B. (2025). Taiwan says US tariffs unreasonable, partly blames Trump policies for trade surplus. *Reuters*, April 3.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taiwan-us-driver-shared-prosperity-us-business-group-says-after-tariffs-2025-04-03/>
- Blanchette, J. & DiPippo, G. (2025).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to strategic anxiety: Taiwan's Trump challenge. *RAND*, March 26. <https://www.rand.org/pubs/commentary/2025/03/from-strategic-ambiguity-to-strategic-anxiety-taiwans.html>
- Brands, H. (2018).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in the age of Trump*.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Buckley, C (2024). Trump says Taiwan should pay for U.S. defens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7. <https://www.nytimes.com/2024/07/17/world/asia/trump-taiwan-defense-chips.htm>
- Bush, R. C. (2021). *Difficult choices: Taiwan's quest for security and the good lif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Campbell, K. K., & Jamieson, K. H. (1990). *Deeds done in words: Presidential rhetoric and the genres of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iorciari, J. D., & Haacke, J. (2019). Hedg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9(3), 367-374.
- Daalder, I. H., & Lindsay, J. M. (2018). The committee to save the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97(6), 72-83.
- Daniels, R (2024).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hange its policies toward Taiwan? *Brookings*, April 16.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should-the-united-states-change-its-policies-toward-taiwan/>
- Davidson, H. (2025). Taiwan vows most advanced tech will not go to US under \$100bn Trump deal. *The Guardian*, March 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25/mar/04/taiwan-trump-semiconductor-deal-tsmc>
- De Guzman, C. (2025). For Taiwan, Trump's strategic ambiguity brings anxious uncertainty. *Time*, February 27. <https://time.com/7262281/us-taiwan-relations-trump-china-strategic-ambiguity-anxious-uncertainty-explainer/>
- Fearon, J. D. (1997).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1(1), 68-90.
- Glebova, D. (2024). US will '100%' support NATO countries that 'pay up' for defense, Trump vows. *New York Post*, March 19. <https://nypost.com/2024/03/19/us-news/nato-countries-must-pay-up-and-alliance-needs-to-treat-us-fairly-trump-argues/>
- Goh, E. (2005).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S in Southeast Asian*

-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Washington, DC: 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 Gomez, E. (2025). Early Trump admin arms sales and rumors of a big request from Taiwan. *Taiwan Security Monitor*, February. <https://tsm.schar.gmu.edu/taiwan-arms-backlog-february-2025-update-early-trump-admin-arms-sales-and-rumors-of-a-big-request-from-taiwan/>
- Gonzalez-Pujol, I. (2024). Theorising the hedging strategy: National interests, objectives, and mixed foreign policy instruments. *All Azimuth: A Journal of Foreign Policy and Peace*, 13(2), 193-214.
- Gordon, S. M., Mullen, M. G., & Sacks, D. (2023). *US-Taiwan relations in a new era: Responding to a more assertive China (Task Force Report 8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https://www.cfr.org/task-force-reports/us-taiwan-relations-in-a-new-era>
- Hunnicut, T. & Brunnstrom, D. (2025). Trump: If NATO members don't pay, US won't defend them. *Reuters*, March 7. <https://www.reuters.com/world/trump-if-nato-members-dont-pay-us-wont-defend-them-2025-03-07/>
- Ikenberry, G. J. (2001). American power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5), 191-212.
- Ikenberry, G. J. (2020). The next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99(4), 133-142.
- Jervis, R. (2017).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D. M., & Jenne, N. (2022). Hedging and grand strategy in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2(2),

205-235.

Kan, S. A. (2009). *Taiwan: Major US arms sales since 1990*. Diane Publishing.

Katzenstein, P. J., & Seybert, L. A. (2018). Uncertainty, risk, power and the limi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P. J. Katzenstein & L. A. Seybert (Eds.), *Protean power: Exploring the uncertain and unexpected in world politics* (pp.27-5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 O. (1988).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4), 379-396.

Keohane, R. O. (2005).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eohane, R. O. (2015). The glob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for political scie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48(1), 19-26.

Kuik, C.-C. (2008).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Affairs*, 30(2), 159-185.

Kuik, C.-C. (2021). Getting hedging right: A small-state perspective.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3(2), 300-315.

Kuik, C.-C. (2024). Explaining hedging: The case of Malaysian equidista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46(1), 43-76.

Lawrence, S. V. (2026). *President Reagan's six assurances to Taiwan*. In *Focus*, February 19. <https://www.congress.gov/crs-product/IF11665>

Lim, D. J., & Cooper, Z. (2015).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24(4), 696-727.

Magraw, M. (2024). Trump reiterates to NATO allies: If you don't pay up,

- ‘I’m not going to protect you’. *Politico*, February 1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4/02/14/trump-nato-allies-00141590>
- Mallard, W. (2025). US drops website wording on not supporting Taiwan independence. *Reuters*, February 16.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drops-website-wording-not-supporting-taiwan-independence-2025-02-16/>
- Martina, M., Lee, Y. & Blanchard, B. (2025). Exclusive: Trump aims to exceed first term’s weapons sales to Taiwan, officials say. *Reuters*. May 30.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trump-aims-exceed-first-terms-weapons-sales-taiwan-officials-say-2025-05-30/>
- Mearsheimer, J. J. (2019). Bound to fai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4), 7-50.
- Mitzen, J. (2006).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 State identity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3), 341-370.
- Narizny, K. (2017). On systemic paradig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A critique of the newest real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2), 155-190.
- Schelling, T. C. (2014). *Arms and influ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hweller, R. (2018). Three cheers for Trump’s foreign policy: What the establishment misses. *Foreign Affairs*, 97(5), 133-143.
- Smith, J. & Geddie, J. (2025). Trump includes US troop costs in tariff talks with Asian allies. *Reuters*, April 17. <https://www.reuters.com/world/trump-includes-us-troop-costs-tariff-talks-with-asian-allies-2025-04-17/>
- Sorace, S. (2025). Trump ‘absolutely’ going to renegotiate USMCA,

- Lutnick says. *Fox Business*, July 20. <https://www.foxbusiness.com/politics/trump-absolutely-going-renegotiate-usmca-lutnick-says>
- Swaine, L. (2023). Freedom of thought 2322. *Political Theory*, 51(1), 234-236.
- Taipei Times (2025). US state department reiterates its stance on Taiwan. *Taipei Times*, October 1.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25/10/01/2003844708>
- The White House (20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vember.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5/12/2025-National-Security-Strategy.pdf>
- Thompson, J. & Chung, Y.-C. (2025). China must see invading Taiwan as not worth the cost: Marco Rubio. *Focus Taiwan*. May 21. <https://focustaiwan.tw/politics/202505210009>
- Toje, A. (2011). The European Union as a small power.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9(1), 43-60.
- Tucker, N. B. (Ed.). (2005). *Dangerous strait: The US-Taiwan-China crisi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Valentine, A. (2025). Taiwanese chip giant's investments in U.S. stir 'silicon shield' security worries. *NPR*, March 12. <https://www.npr.org/2025/03/12/g-s1-53275/taiwan-tsmc-us-investments-security-worries>
- Vander Vennet, N. V., & Salman, M. (2019). Strategic hedging and changes in geopolitical capabilities for second-tier states.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 86-134.
- Weitsman, P. A. (2004). *Dangerous alliances: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C.-L., & Lin, A. M.-W. (2019). The certainty of uncertainty:

Taiwanese public opinion on US–Taiw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Trump presidency. *World Affairs*, 182(4), 350-369.

Yang, S. & Wu, X.-Y. (2025). Trump's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is reshaping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19.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5-03-19/trumps-transactional-diplomacy-is-reshaping-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u-s-and-taiwan>

A Reassessment of Taiwan's Strategic Risks Under the Logic of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in the First Year of Trump's Second Term

Shih-Kai Lin *

This article takes the first year of Trump's second term as its period of observation and examines how Trump's transactional diplomatic rhetoric and policy logic, through the loosening of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s, has affected Taiwan's perception of strategic risk.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is not merely an expression of Trump's diplomatic style, but also a diplomatic logic that renders security commitments conditional and negotiable, thereby further reshaping the structure of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risk assessment in U.S.-Taiwan relations. Methodologically, this study adopts a qualitative contextual analysis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osed of "Trump's transactional diplomatic logic," "the stability of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s," "Taiwan's strategic risk perception," and "hedg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interrelationship among diplomatic rhetoric,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 and policy respons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when the predictability and consistency of U.S. commitments to Taiwan decline, Taiwan's doubts about the credibility of U.S. security support rise significantly, prompting the policy community to adopt

*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Shui Sha Lian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Innov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hedging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multilateral linkages, building institutional backups, and diversifying risk. Theoretic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transactional ambiguity diplomacy” to address the explanatory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studies on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 with respect to linguistic shifts and the mechanisms of risk formation. Practically, it suggests that Taiwan should establish an early-warning mechanism for shifts in diplomatic rhetoric and strengthen its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and strategic response capacity.

Keywords: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institutional commitment, strategic risk, hedging strategy, diplomatic ambiguity

